

魯迅研究

夏征農編



上海生活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2896119

目次

我們從魯迅先生學取些什麼(代序)·····	編者(一)
魯迅的生活·····	許壽裳(一〇)
民族的思想上的戰士——魯迅先生·····	艾思奇(四)
魯迅先生對於科學·····	周建人(五)
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	雪葦(六)
魯迅的雜文·····	徐懋庸(七)
魯迅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漢夫(六)
魯迅與中國新文學運動·····	梅雨(三)
魯迅與新文字運動·····	胡繩(二九)

魯迅先生和中國新興的木刻·····	曹白(二六二)
魯迅主義底永遠的敵人·····	歐陽山(二九六)



(月九年四三九一)海上於嬰海子公及平廣許人夫和迅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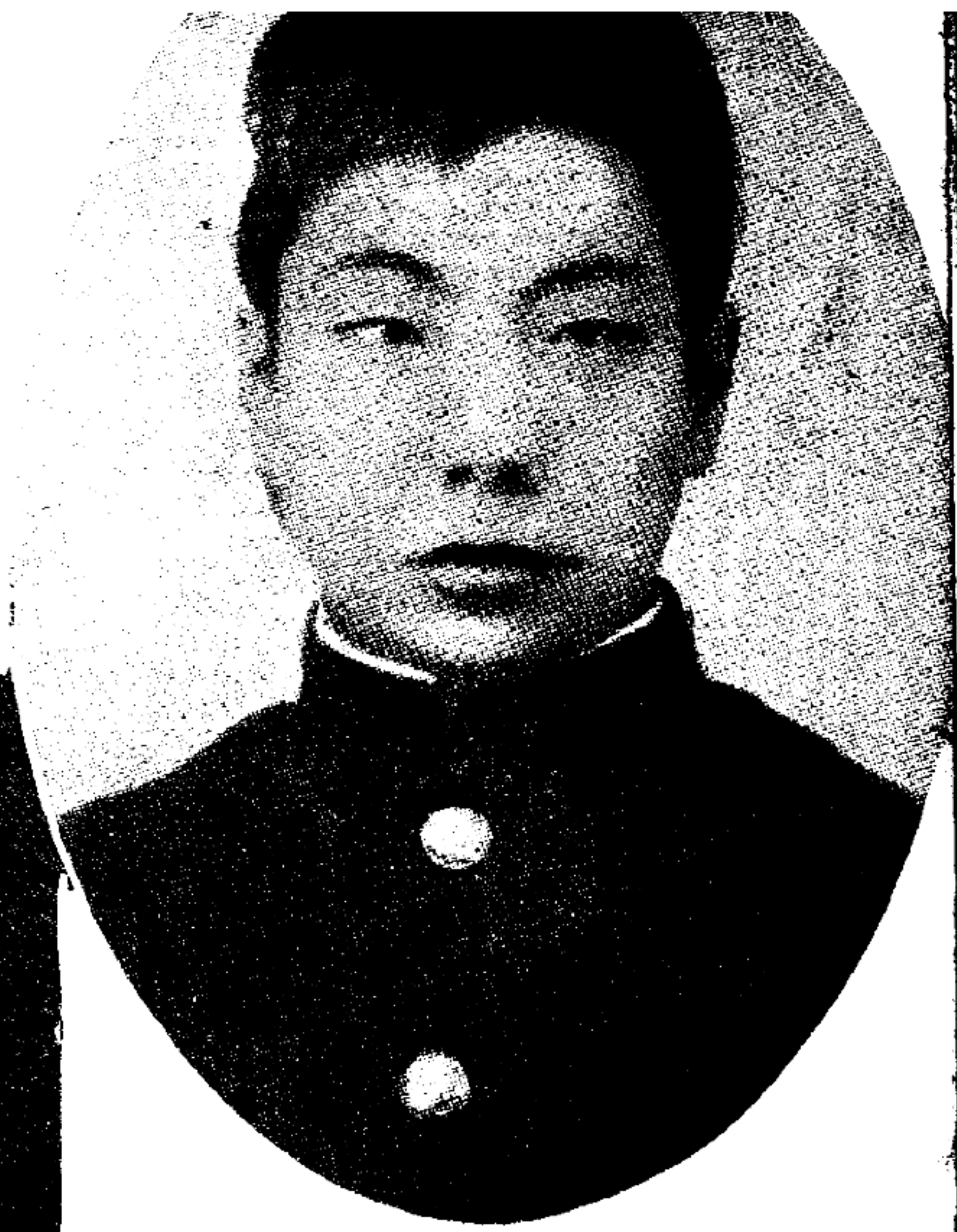


一萬餘羣衆參與殯儀之行列



在萬國公墓禮堂舉行葬儀時宋慶齡女士演說

留學日本時代



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在北平與段、章輩鬥爭時代

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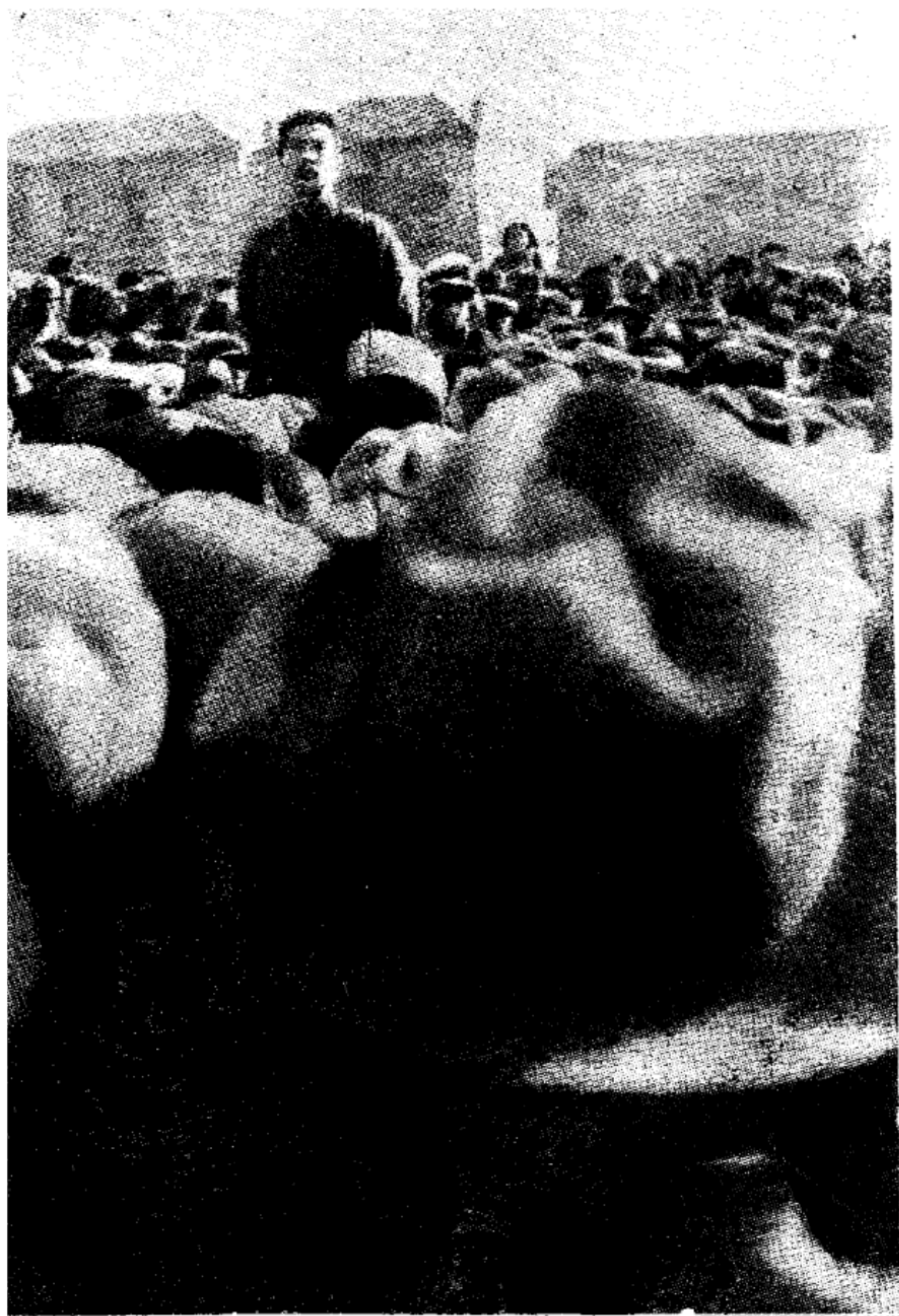
(年七二九一)州廣在



在上海(一九三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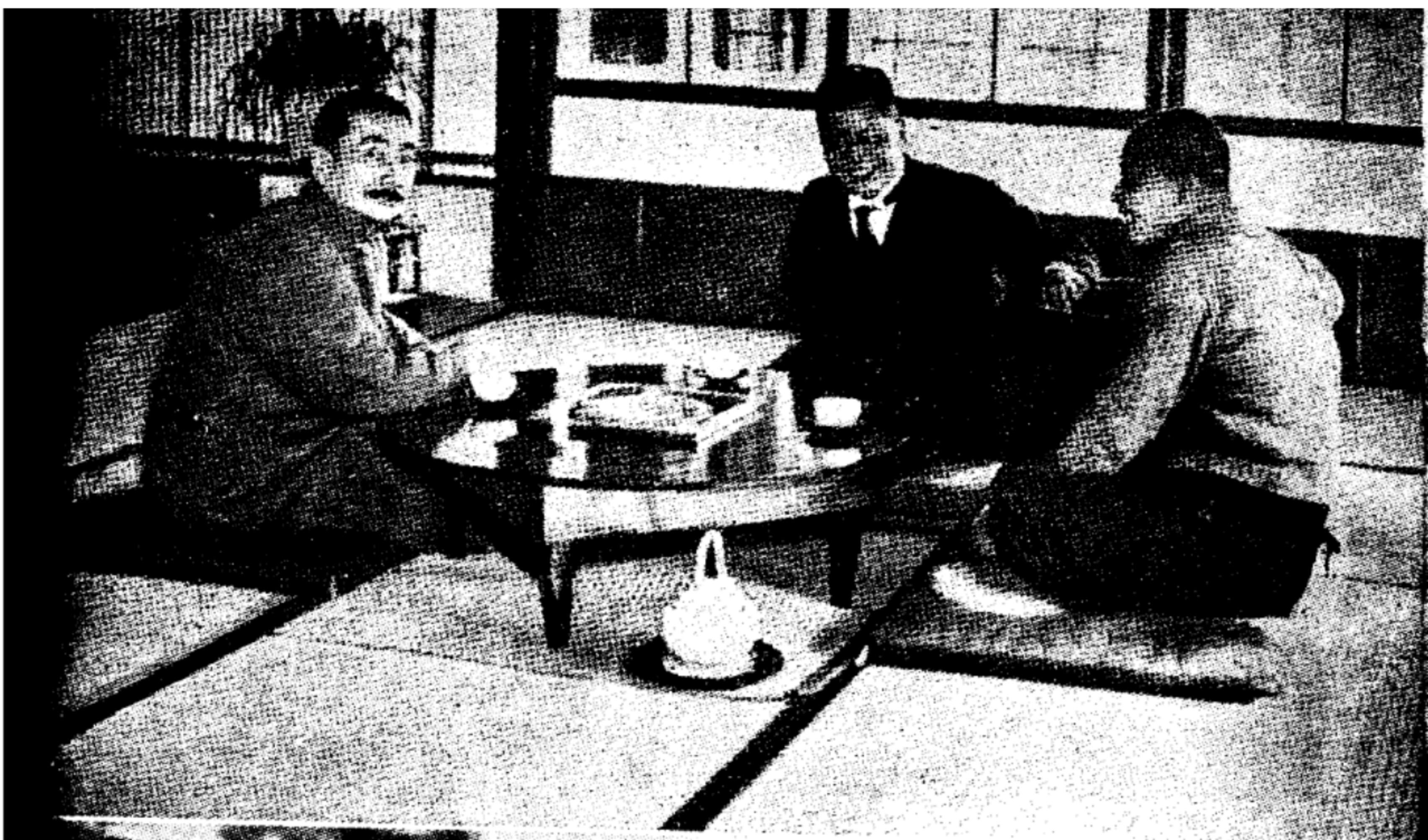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在北平演講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孫中山夫人宅與蕭伯納會晤





談聚人友本日與海上在



(年四三九一)海上在

逝世前
數日在
第一次
全國木
刻展覽
會與青
年木刻
家們歡
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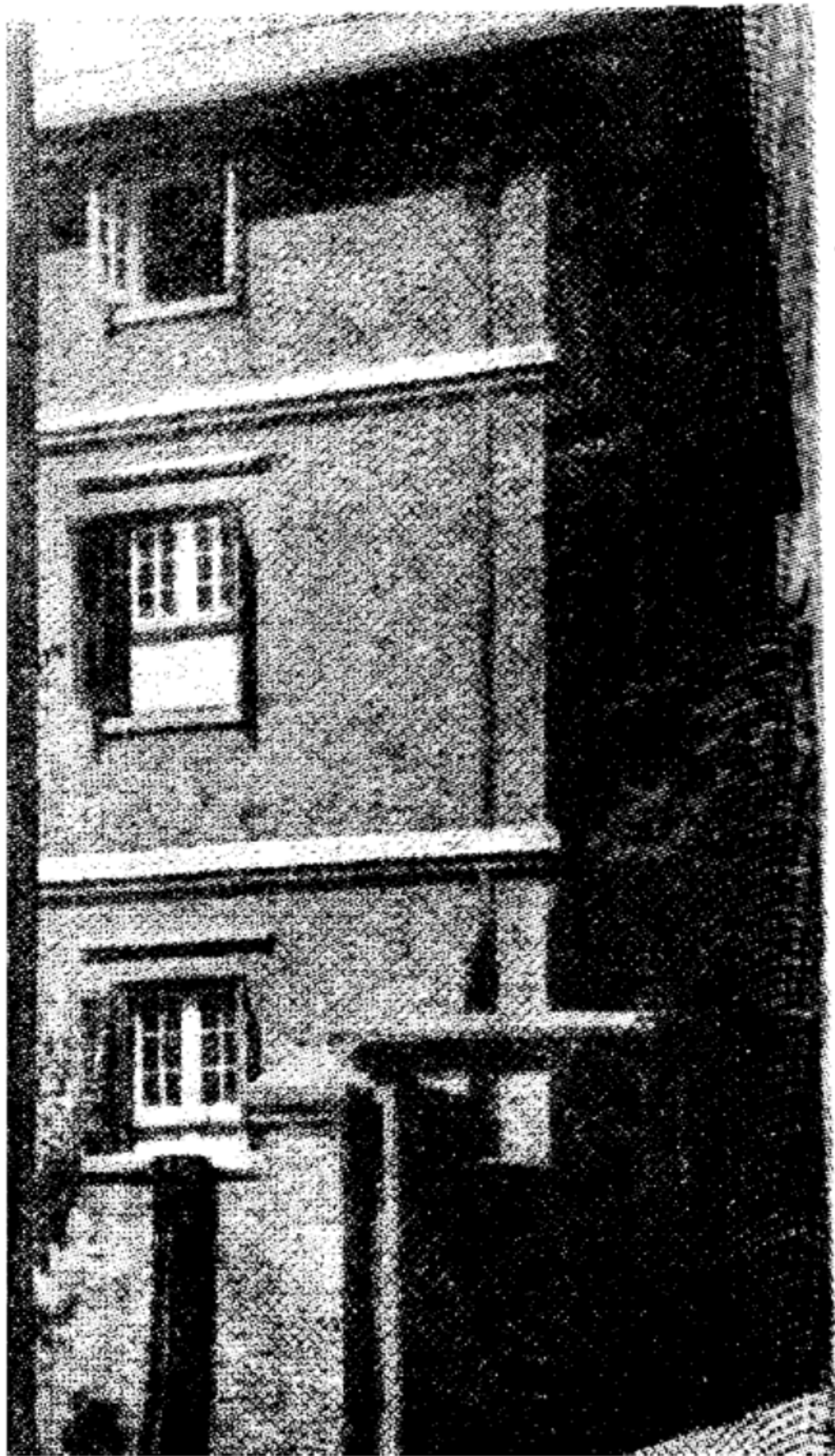
遺容



治喪委員與執紼者蔡元培章乃器籌



寫字桌



魯迅先生另一藏書處

海上述林

上卷之序

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及，作者既佳，譯者又是名手，佳而
 且達，蓋世無兩。其中，高爾基論文，高爾基論文，
 集^{兩種}為埋埋巨製，此外論說，亦不一而足，正以至此，
 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紙張折損甚九幅。僅印五百部，
 內一石成春麻布面，全項，每本定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紙面，
 定價二元五角。土價部裝二元三角，下卷與于本
 定價二元五角。

魯迅先生手蹟

我們從魯迅先生學取些什麼（代序）

編者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

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墳

當黑暗和光明到了最後的決鬥：法西斯主義與和平主義，侵掠者漢奸與被壓迫人民大眾正在肉搏的時候，突然我們那最敬愛的「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民族革命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了。

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也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中華民族的靈魂。列甯稱托爾斯泰為『俄國革命的鏡子』，但魯迅先生之服務於中國革命是決不單是盡了『鏡子』的作用的，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他暴露了黑暗社會的全面，他揭發了中國民族的各種缺點。不僅這樣，他從黑暗中看出了光明；他明白地宣

言：『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以爲唯有新與無產者纔有將來。』（『二心集序言』）他正確地指出『死者遺給後來的功德，是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續華蓋集空談）

魯迅先生雖不如高爾基一樣出身於流浪兒，但他和中國革命的聯系却與高爾基和俄國革命的聯系沒有什麼差別。他的全部生活，完全反映出了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他始終服務於革命，始終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說話。

辛亥革命的初期，他是抱着一種『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的希望去學習的。到了這種希望粉碎了，於是他就馬上來『提倡文藝運動』，決定以文藝來改變國人的『精神』；就從那展開中國革命新面目的五四時代起，開始了他的十八年的艱苦的戰鬥生活。一登場，他便毫無顧忌喊出了舊禮教的滅亡，唱出了舊社會的崩潰。（看吶喊）『他不單是對於熱情者們有同感』，而完全『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後來，作爲那時新文化運動指導者的『新青年』散掉了。他雖然

因爲『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而感到彷徨起來，但他的『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精神，仍然存在，且更是使他認識了『現在的屠殺者』。（看彷徨）由於他的這種不屈的精神，經過了『五卅』的高潮，他的力量也就一天一天激發着。他從自己的經驗，體會出了『同戰陣中的伙伴』的『變化』，是『無礙於進行的』，只有『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他的腳愈踏得落實，他的筆愈刺得有力。他不但剝脫了躲在帝國主義軍閥的指揮刀下的劊子手，他還指出了『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才子加流氓的毒汁。（看而已集，二心集，三閒集等）這種毒汁不僅傳染在當時的文化陣營中，且傳染在政治陣營中。一九三〇年在他領導下的新文化陣線的建立，就是肅清這種毒汁的結果。從那時起，他的生活，更是與中國革命打成了一片，成了中國民族革命的文化前衛，一直到他最後一次的呼息。我們看他在逝世一月前所發表的言論吧：

『中國目前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統一戰線問題）。

而且他不但是同意，不但是擁護，他以他一貫的戰鬥精神，毫不放鬆地發動了一次極有意義的論爭，提供了許多可寶貴的戰略，以及運用戰略的方法。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路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或任何方面有點忽略，因為就是小

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幾個主要問題）

我們十分相信：這問題因他而展開了整個細目，這問題因他而更趨於具體化。這時候的魯迅先生與十八年前的魯迅先生，除了年齡上，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有之，只是艱苦的環境，把他鍛鍊成了更結實，更倔強，更勇敢。他的一滴血，一滴汗，都是爲全人類，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流！他是我們全民族的！

然而，現在，這偉大的導師，這勇敢的戰士，我們的魯迅先生，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了。

這無疑的是全民族的巨大損失。給予我們的，不單是個人的悲慟，而是一個晴天霹靂的警告：在敵人的瘋狂進逼下，我們喪失了一股無比的力量！

我們不僅是要向這位巨人表示哀悼，我們更要號召全國文化人，全國知識青年，以及全國的民族戰士來繼承這位巨人的遺志；把那肩起『黑暗的閘門』的責任，放到自己的肩上來。

我們不但要向這位巨人學習創作方法，我們更要向這位巨人學習一切革命的戰術。

我們要學習他那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從天上掉下的，而是從他的實生活中鍛鍊出來的。他抱着『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的信心，於是他有正視黑暗的勇氣，無論是臨到大戰鬥或者是日常生活鬥爭中，他不曾做一次旁觀者。他採取着各種戰略向敵人射擊。『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心集）他一直表現了他的這種機敏和韌性。他極力反對空談，反對虛偽，反對那『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二心集）他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幹。比如，他在論到現在的文學運動時，就明白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他反對寬容，他非常了解『對敵人寬容，即是對同志殘忍』的教訓。他指出『不打落水狗』，而讓牠慢慢爬起來咬自己的人，是『自家掘坑自家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他最近還宣言：『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這正是一個典型的戰士的姿態，這種姿態，決不是時下的『空頭革命文學家』，以及一些專只會『站在樹梢上說風涼話』的人所能模倣的。不從魯迅先生的實生活出發，便決不能認識魯迅先生的偉大，自己離開了社會的實際鬥爭，也便決不配談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

魯迅先生的生活思想的發展，並不是直線的，並不是自始至終毫無曲折地一直是站在最高峯。他常常在虛心地學習：從前人的教訓中，從自己的生活中，從青年大眾中。他曾經彷徨過，曾經陷入過『偏見』的泥坑裏，但他的實際的努力很快地便把他糾正過來了。他對於自己和創造社的論戰，就這樣坦白地承認：『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學論，明白了先前

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問題……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開集序言）我們看到魯迅先生常常是青年的，那就是因為他時時浸潤在青年們的情熱中；他教育青年，青年也教育了他。我們應該學取他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學取他的這種從生活中去教育自己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堅強便會變成固執，果敢便會變成狂暴，這樣的人，即使天天捧着魯迅先生，還是永遠和魯迅先生格格不相入的。

魯迅先生是死了，但我們十分相信，魯迅先生已經教育出了無數萬的新的戰士！

魯迅先生是死了，但我們十分相信，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將隨着中國民族解放而永遠存在！

然而，我們仍要向全國號召：從今天起，我們要把魯迅先生貢獻給全民族。我們要擴大來研究魯迅，學習魯迅。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注射入全中

國。人。民。的。血。液。裏。

我們要唱着：

你安息吧，導師，

我們會跟着你底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來

我們站在你底墓前，報告你：

我們完成了你底志願。

——魯迅先生輓歌

魯迅的生活

許壽裳講
沈蕙芳記

——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

前兩天，王同學來說，定於今天下午三時半在本院開魯迅座談會，要我講點關於魯迅先生的生活情形，我便忻然的答應了，所以我今天所講的題目是關於他的生活。魯迅是預言家、是詩人、是戰士。我在懷亡友魯迅文中說過：『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們中華民族的傑作。這樣偉大的一生決不是短時間所能說盡的，不過隨便談談，得個大概罷了。

在開講之前，我要問諸位一聲，諸位大概在中學時代，甚而至於在小學時代已經讀過了魯迅的作品。讀了之後，在沒有會見他或者沒有見過他的照相之前，那時諸位的想象中，魯迅是怎樣一個人？這種回憶，對於魯迅的認識上是很有幫

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兒，十餘年前，在孔德學校小學班已經讀了魯迅的作品。有一天，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她便高興之極，跳躍出去看，只覺得他的帽子邊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等到掛上帽架，她仰着頭仔細一望，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後來，她對父親說：『周老伯的樣子很奇怪。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穿着西裝，皮鞋，頭髮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這樣漂亮，他的服裝爲什麼這樣不講究呢？』

再講一個近時的故事：這見於日本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文中，用對話體記着有一天，魯迅照常穿着粗樸的藍布長衫，廉價的橡皮底的中國跑鞋，到大馬路 Cathay Hotel 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理會的臉孔，我以爲也許有誰要來罷，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一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

是乎說「走出去！」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才怪呢！後來先生怎樣呢？」

「沒有辦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層樓；於是乎碰見了目的的人，談了兩小時光景的話，回來的時候，那英國人送我到電梯上。恰巧，停下來的那一部電梯。英國人非常殷勤，所以這次沒有趕出我，不，不是的，那個司機非常窘呢。——哈哈……」（譯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見改造十八卷十二號）

關於魯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個英國人的話，頗覺簡而得要，這見於 H. E. Shadick 的對魯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曾會見過魯迅，只是從照相上觀察，說道：

「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着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誠懇的人纔具備的。前額之下，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鬱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鬚却好像把他的仁

慈掩蓋過去。

『這些特質同樣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裏……』（原文見燕大週刊叢書之一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

魯迅的生活狀況可分爲七個時期：（一）幼年在家時期，一——十七歲；（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十八——二十一歲；（三）日本留學時期，二十二——二十九歲；（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二十九——三十一歲；（五）北京工作時期，三十二——四十六歲；（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七）上海工作時期，四十七——五十六歲。

一、幼年在家時期 一至十七歲……預備時期（一八八一——一八九七），這期的時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戰。

魯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憶錄——舊事重提，後改名爲朝華夕拾——可供參考，現在略舉幾個特點如下：

(一)好看戲

(甲) 五猖會 (見朝華夕拾) 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歲時候，正當高興之際，突然受了打擊，他的父親要他讀熟鑑略數十行，背不出不准去，後來雖然背出，不遺一字，却已弄到興趣索然。

(乙) 社戲 (見吶喊)(丙) 夜戲，目蓮戲 (見朝華夕拾：無常)

(丁) 女吊 (見中流三期)：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一種便是『女吊』，也叫作『吊神』，是帶復讎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魯迅臨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寓所，也談到這『女吊』，這可稱魯迅的最後談話 (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後一天的魯迅，記及此事，見日本雜誌文藝四卷十二號)。

(戊) 胡氏祠堂看戲：這點在他的著作裏面是沒有談到，我從他的母親那裏聽來的。在十餘歲時候，胡家祠堂裏演戲，他事先已經看好了一個地方——遠處的石凳。不料臨時爲母親所阻止，終於哭了執意要去看，至則大門已關，不得進去。後來知道這一天，因爲看客太多，擠得石凳斷了，摔下來，竟有被壓斷脛骨的。他之不得其門而入，幸哉幸哉！

他幼年愛好看戲，至於如此，可是後來厭惡舊劇了。

(二) 好描畫

(甲) 描畫：用一種荆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見朝華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乙) 搜集圖畫（見朝華夕拾：阿長與山海經和二十四孝圖）

這和他後來中年的搜集，研究漢畫像，晚年的提倡版畫有密切的關係。

(二) 不受騙

(甲) 不聽衍太太的擺佈（見朝華夕拾八五葉）。

(乙) 對於二十四孝圖的懷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於發生反感的，是「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件事」（見朝華夕拾三五葉）。

這樣從小就有獨到之見，和上述的藝術興趣，可見他在此時期，天才的萌芽已經顯露出來了。

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 十八至二十一歲……（一八九八——一九〇一）這期的國家大事有戊戌變法和庚子義和團之役。

他的學堂生活從此開始，起初考入水師學堂，後才改入礦路學堂，朝華夕拾裏有一篇瑣記是可參考的。此外，還有幾件事：

(一) 愛看小說 新小說購閱不少。對於功課從不溫習，也無須溫習，而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什居其八。

(二)好騎馬 往往由馬上墜落，皮破血流，卻不以爲意，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三)不喜交際

至於苦學的情況，如以八圓旅費上南京，夾袴過冬，凡上下輪船總是坐獨輪車，一邊攜行李，一邊留自己坐。

三、日本留學時期 二十二至二十九歲……修養時期（一九〇二——一九〇九夏），這期的大事是俄兵佔領奉天，日俄開戰，革命思潮起於全國，和他個人關係較切的有章太炎師的下獄，徐錫麟秋瑾的被殺等。

這留學時期又可分爲三個小段：（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期，（三）東京研究文學時期。

（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夏）

此時，我初次和他相識，他在課餘愛讀哲學文學的書以及常常和我談國民性

問題，這些已見於拙著懷亡友魯迅，茲不贅述。他曾爲浙江潮撰文，有斯巴達之魂，說鉅等（見集外集），鉅卽鑄也。

（三）仙台醫學時期（一九〇四——一九〇六春）

他學醫的動機：（一）痛恨中醫就誤了他的父親的病，（二）確知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醫的事實。以上兩點，參閱吶喊序文和朝華夕拾：父親的病便知。但是據我所知，除此以外，還對於一件具體的事實起了弘願，也可以說是一種癡想，就是：（三）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模樣。後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於斷念絕望，使他對纏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恨趙宋以後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裏寫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淚的。例如：

（1）見了繡花的弓鞋就搖頭（朝華夕拾一一四葉）。

(2) 『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可是她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她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爲樂，醜惡爲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熱風三五集)

(3) 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一在土場上一溜一拐的往來。(吶喊：風波)

(4) 討厭的『豆腐西施』，『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吶喊：故鄉)

(5) 愛姑的『兩隻鉤刀樣的脚。』(彷徨：離婚)

(6) 『……女子的脚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

寧可走不成路，搖搖擺擺。』(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脚推定中國人之非

中庸)

他的感觸多端，從此着重在國民性劣點的研究了。可見吶喊序文所載，在微生物學講義的電影裏，忽然看到咱們中國人的將被斬，就要退學，決意提倡文藝運動，這電影不過是一種刺激，並不是惟一的刺激。

(三) 東京研究文學時期（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夏）

一九〇二年的夏天，留日學生的人數還不過二三百，後來『速成班』日見增多，人數達到二萬，真是浩浩蕩蕩，他們所習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農、工、商、醫、陸軍、教育等，學文藝的簡直沒有，據說學了文學將來是要餓死的。

然而魯迅就從此致力於文藝運動，至死不懈。

此時，他首先介紹歐洲新文藝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文學。有兩件事應該提到的：（一）擬辦雜誌『新生』，（二）譯域外小說。這兩件事說來頗長，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關於魯迅』（二二）（宇宙風三十期）

文中已經敘明，我不必重複詳說，只略略有所補充而已。新生雖然沒有辦成，可是書面的圖案以及插圖等等，記得是統統預備好了，一事不苟的；連它的西文譯名，也不肯隨俗用現代外國語，而必須用拉丁文曰 *YOUTH*。後來，魯迅爲河南雜誌撰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墳），介紹英國擺倫、德國尼采、奈賓霍爾，挪威易卜生，及俄國波蘭匈牙利詩人等。域外小說集初印本的書面也是很優美的，圖案是希臘的藝術，題字是篆文「域外小說」紙質甚佳，毛邊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鋒。它的民七，一月號，胡適之的歸國雜感，說調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書簿，「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想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會聽見過，不要說 *Tshekhov* 和 *Andrejev* 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開始譯 *Tshekhov* 和 *Andrejev* 的短篇小說了。

魯迅實在是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個人。

總之，他在游學時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國民性問題，養成了冷靜而又冷靜的頭腦。惟其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愈熱烈，所以觀察得愈冷靜。這好比一個醫道高明的醫師，遇到了平生最親愛的人，患着極度危險的痼疾，當仁不讓，見義勇為，一心要把他治好。試問這個醫師在這時候，是否極度冷靜地診察，還是蹦蹦跳跳，叫囂不止呢？這冷靜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 二十九至三十一歲（一九〇九夏——一九一一冬），這時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為要負擔家庭的費用，不得不歸國做事了。在杭州任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和化學教員一整年，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一年餘，革命以後，任師範學校校長幾個月。

在兩級師範教化學的時候，有過這樣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燃燒，

因爲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所以孫春台（福熙）的我所見於『示衆』者裏說：『魯迅先生是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爲愛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愛人，不給人以輕氣瓶中混入空氣燃燒時就要爆裂的智識，他不至於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報副刊）

五、北平工作時期 三十二至四十六歲（民元——十五年秋，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六年秋）。

這期的大事，國內有民元中華民國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條的威脅及洪憲稱帝，民六張勳復辟運動，民十四孫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慘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慘案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國外有世界大戰。

元年一月，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子民先生之招，到部辦事，公餘老是鈔沈下賢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鴻禕）去訪駐防旗營的殘址，只見已經成了一片瓦礫場，偶爾瞻着破屋幾間，門窗全缺，情狀是很可憐，使他記起了從前在礦路學堂讀書的時候，騎馬過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揚鞭窮追，以致墜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紹興會館，先在藤花館，後在古槐書屋，這便是相傳在槐樹上縊過一個女人，從此多年沒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灣，十二年遷寓甄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宮門口西三條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間又可分爲前後兩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國七年）爲界，前者重在輯錄研究，後者重在創作。

前期住在會館，散值的工作是：（一）鈔古碑，（二）輯故事，這二事可參考知堂的關於魯迅（宇宙風二九期），（三）讀佛經。魯迅的信仰是科學，不是

宗教，他說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不會復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只作人類思想史的材料看，藉此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別人讀佛經，就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

至於他的創作短篇小說，開始在民國七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值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記，才用「魯迅」作筆名，「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的創作力好像長江大河，滾滾不絕。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爲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現在時間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作個舉例的說明而已。

狂人日記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抨擊禮教的。據魯迅自己說：「因那時的認爲『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

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參閱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這是實實在在的話，試問讀到篇中所云：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有誰不感到禮教的迫害，有誰不想奮起而來攻擊呢？他的其餘作品有好多篇彷彿可作這狂人日記的說明，祝福便是一個例子。祝福的慘事，不慘在狼吃了阿毛，而慘在禮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時在南昌，讀到狂人日記就非常感動，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一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侯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於唐侯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侯堂罷。」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侯」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很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侯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侯」，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

阿Q正傳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華蓋集續編）：

阿Q正傳的成因)。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篇諷刺小說，在描寫中國民族的魂靈。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報副刊上說過：「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實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爲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爲痛切，因爲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園地八。後來印成單行本的時候，這一篇未見收入。)

阿Q正傳，發表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到現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讀到它，總感覺一種深刻和嚴肅，並且覺得在魯迅的其餘作品中，有許多處似乎可當作這篇的注解或說明來讀，因爲描寫阿Q的劣性彷彿便是描寫民族的劣性故也。

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說不到什麼意識。（一九二九，小小十年小引——三閑集）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一九三一，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二心集）

問題重要的是在怎樣的看法。譬如別人寫跳舞場罷，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寫。但我們的寫法就和他們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寫實。（參看周文：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中流第五期）

但是，魯迅先生並不以為『寫實』便是『記錄』。在他看來，一篇小說跟一篇『新聞記事』不同。新聞記事只要按事記錄就行，而小說——一篇文藝作品，那就不這麼簡單，是要應用作家藝術的手腕，經過事實的分析，藝術的概括，生

現在隨便舉出幾點，彼此參照，便可瞭然，例如：

(一)自大 阿Q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宛然是以『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負的國粹派的口吻，魯迅所時常指摘的：『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熱風十八，十九葉)

(二)卑怯 阿Q『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試讀『隨感錄四十八』有云：『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熱風四三葉)還有通訊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說：情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

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
有外敵。要糾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華蓋集二二集）還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着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華蓋集五七、五八兩葉）

（三）善變——投機，迎合取巧 阿Q本來是深惡革命的，後來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罷』……試讀忽然想到四裏的話：「……其實這些人

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到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滅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運。」

（華蓋集十二，十三兩葉）還有算賬裏說：「……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花邊文學七九葉）

（四）自欺——精神上的勝利法——阿Q在形式上打敗之後，有種種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兒子打了，或者說自己蟲豸好不好，或者簡直自己打兩個

嘴巴，就立刻心滿意足了。這類自欺欺人，別設騙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間也何嘗沒有？『……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是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

尾，都有着一貫的寫作理論的系統。而且這是無毛病的，也無矛盾的。這，對於那些老用着那一套油滑腔調，以及愛叫『轉變後的魯迅』如何如何，『轉變前的魯迅』又如何如何者們，同樣給予了一個極堅固的回答！自然，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雖一貫，而却有發展，雖沒有內部衝突的矛盾，然而却有着粗精之別。但跟其他的問題一樣，在寫作問題上的魯迅，他也沒有在理論上走過岔路，是很明顯的。所以既不背馳，又何來回『轉』。在新青年——創造社（一九一八——一九二七）的時期，文藝活動中，正迷漫着主觀的個人主義的寫作理論；然而他却沒有接受這些影響，相反，他是客觀的社會的『民衆主義』的。又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的時期，文藝活動的主流，迷漫着機械論的，『標語口號』的寫作理論（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左傾觀念論的，到處向作家索問『正確的世界觀』的寫作理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三）。然而如上所見，他在這裏也沒有陷入過『歷史的錯誤』。他既反對離開『文藝』的狂叫；也堅決的主張只有實際的寫作才能

爲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

……」（墳：論睜了眼看）

此外，描寫着的劣性還很多，限於時間，不及備舉了。

十五年三一八慘案後，四月奉軍進京，有通緝名單的傳言，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十餘人，避居D醫院的一間堆棧房裏若干日。魯迅在這樣流離顛沛之中，還是不斷地寫文章，朝華夕拾裏的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都是這時的作品。

這期的重要創作，已經結集者有：

小說 吶喊

同上 彷徨

論文 墳

講義 中國小說史略

散文詩 野草

回憶文 朝華夕拾(前半部)

雜感集 熱風

同上 華蓋集

同上 華蓋集續編

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 四十六——四十七歲(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一

九二六——一九二七)，時代背景是寧漢分裂，國民黨清黨運動。

這時期雖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魯迅感觸多端，不很開口，「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寞。」因之，生活極不安定，宿屢有更變。在廈門四個月，因為『不合時宜』，搬來搬去，終於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雖對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氣也不甚感動，所不能忘懷的，倒是一道城牆，據說是鄭成功的遺跡。「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

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二二二葉）到廣州後，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仍舊合居。……我這樓外却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蛋戶的船，一艘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裏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一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小約翰：引言）諸位請讀兩地書，及三問集裏的怎麼寫，在鐘樓上兩篇，便可以知道那時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廈門大學擔任什麼科目，至於在中山大學，則任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等，因為選修文學論的學生人數太多，以致上課時間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禮堂。這期的著作如下：

通訊 兩地書（與景宋合著）

回憶文 朝華夕拾（後半部）

雜感集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附在華蓋集續編之後）

同上 而已集

講義 中國文學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時期 四十七至五十六歲（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

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國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濟南

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後東四省的淪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戰。

這十年之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魯迅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上海文壇的淺薄空虛，一點也不肯放鬆，挺身而前，一奮筆彈射，無所避迴，於是身在圍攻，禁錮之中，而氣不稍餒，始終奮鬥，決不屈服。這時期可以稱為短評時期。他的短評，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詩，精悍無比。不識

者奚落他，稱之爲『雜感家』，殊不知這正是他的戰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麼領袖，也沒有『藏之名山一』的意思，以爲一切應時的文字，應該任其消滅的。熱風序文裏說得好：『……幾個朋友却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尙在。』所以他的十多本雜感集大都是應時而作，只要時弊快快去掉，則他的文字本來願意歡歡喜喜地消滅。

上海不是個好住處，不說別的，單是空中的煤灰和鄰居的無線電收音，已經夠使他心煩氣悶了。他常對我說，頗想離開上海，仍回北平，因爲有北平圖書館可以利用，願意將未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寫成。它的大綱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無邪，離騷與反離騷，藥與酒……他的觀察史實，總是比別人深一層，能發別人所未發，所以每章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們試讀而已集裏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

藥及酒之關係，便可窺見一斑。這是他的中國文學史的一段，思想很新穎，議論很透闢，將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發露出來，成了完全和舊說不同的樣子。我正盼望這部大著作能夠早日觀成，不料他竟齋志以歿，連腹稿也同埋地下，這是無可彌補的大損失！

近年來，他寫文章之外，更致力於大衆藝術和大衆語文。前者是提倡版畫，因其好玩，簡便，而且有用，認爲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他個人首先搜集了許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時借給別人去展覽，有時用玻璃版翻印出來，如士敏士之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使藝術學徒有所觀摩。一面，在上海創辦木刻速修講習會，從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譯，都由他一個人擔任的。這個藝術現在已經很有進步，可以說風行全國了。後者是鼓吹大衆語，因爲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他說「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爲（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

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論大衆語）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舉如下：

雜感集 三閱集

同上 二心集

同上 南腔北調集

同上 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

同上 淮風月談

同上 花邊文學

小說 故事新編

雜文 集外集

此外，近年散見各種雜誌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結集起來，否則一定又添了

一個有趣的書名。有一本題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魯迅雜文集」，在他逝世的一個月——十月印行的，編次甚亂而銷行甚廣，決不是他自己編訂的東西，前面既無序文，書尾也不貼版花。自從他一去世，投機取巧的市僧，東鈔西撮，紛紛出書，什麼魯迅自述啦，魯迅雜感集啦，魯迅諷刺文集啦，魯迅最後遺著啦，陳列在書攤上，五花八門，指不勝屈。更有無恥之徒，冒名取利者，將別人的作品，換一個臨時封面，公然題作「魯迅著」，例如活力，歸家等等，尤其可惡。請諸位千萬注意，別去上當！

以上所談，只關於他的創作方面，至於翻譯，已經印行的不下三十種，工作也極其認真，字字忠實，不肯絲毫苟且，並且善能達出原文的神旨，這也是譯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寶。

總之，魯迅無論求學、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誠和摯愛的態度，始終如一，凡是和他接近過的人一定會感覺到的。他的勤苦耐勞，孜孜不倦，真可以

忘食、忘寒暑、忘晝夜。在廣州住白雲樓的時候，天氣炎熱，他的住室，陽光侵入到大半間，別人手上搖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兩窗之間的壁下，伏案寫稿，手不停揮：修訂和重鈔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華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等等。他居上海以後，為生活費的關係，勤勞更甚。書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張藤躺椅上，看看報，或是談談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覽極少，酬應最怕，大抵可辭則辭。衣服是布製的；鞋當初是皮的，十餘年來是膠皮底帆布面的；臥牀向用板牀，近十年來才改；寫字始終用毛筆。除了多吸烟捲而外，一無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質樸的學生時代的生活。

他的真摯，我不用說別的，就在遊戲文字裏，也是不失當度，試讀我的失戀，便可知道。這本來是打油詩，其中所云：『愛人贈我百蝶巾，問她什麼：貓頭鷹。』『愛人贈我雙燕圖，問她什麼：冰糖蜜蘆。』『愛人贈我金錶索，問她

什麼：發汗藥。『愛人贈我玫瑰花，回她什麼：赤練蛇。』（野草十一至十四葉）似乎是信口胡謔了，其實不然。要曉得貓頭鷹，發汗藥之類，的確是他自己所心愛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並沒有一點做作。

他的富於友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幫人的忙，濟人的急，尤其是對於青年，體貼無微不至。但是竟還有人說他脾氣大，不易相處，這是我所不解。

他這樣地犧牲了個人生前的幸福，努力為民族的生存和進步而奮鬥，患肺結核而至於醫師多次警告了，還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趕快做』，真是實踐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

我說過：魯迅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澈底。現在話已說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詩中的兩句作為今天談話的總括罷：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靜，下句表熱烈。關於上句，請參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墳：寫在「墳」後面）下句請參閱救救孩子（狂人日記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又景宋的哀詩所引用的『我好像一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民族的思想上的戰士——魯迅先生

艾思奇

我很想用虔誠的態度，根據充分的研究，寫一本評論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書。無論做什麼事，都需要虔誠態度和充分的研究，但對於魯迅先生尤其更要這樣。因為魯迅先生自己就是一個虔誠不苟的工作者，不論寫一個條子，一封短簡，凡是從他手裏出來的東西，都是非常工整的。這並不是封建時代循規蹈矩的那種工整，這是一個前進的戰士所應該取法的切實和嚴整。魯迅先生所以能始終前進，始終成爲青年們的領導者，而對於中國人能夠給與極大的影響，就因爲他是這樣一個能使自己嚴整的戰士。真正的戰士並不是完全不負責任的破壞者，他要在破壞陳舊勢力的戰鬥中不斷地建立自己，約束自己。

對於一個勇敢的戰士，我們不抱着同樣勇敢的心情去看他，是不能了解他

的，不以同樣虔誠的態度去研究一個虔誠的工作者，也同樣不會有好的結果。魯迅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工作遺產，是豐富而且高貴。單就思想方面來說，他也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人們談起來的時候，總常說他並不單單是一個文藝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是的，他在文藝上是給新文學建立了一個極其堅固的基礎，新文學不單只做了破壞工作，也做了建設工作，這雖然不完全是魯迅先生一人的力量，然而他却盡了最巨大的力量。是的，他對於文字的使用能力和表現能力，在目前是沒有人能比擬的。他的思想，因了他的文字才有這樣的影響。但我們又可以反過來說，他的思想也是重要的，沒有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也怕不會這樣的光輝。

有人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寫最初的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前，他過着一段蟄伏的生活，對人生的失望，思想上的懷疑，使他甚至不能寫作。在狂人日記以後的吶喊和熱風的時代，他成了反

封建的積極的戰士。這時他的文字就鋒利，明快，而有生氣。當他作彷徨，華蓋集時，憂鬱的思想又籠罩了他，雖然也在戰鬥，但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爐火純青時代，其實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後，創作固然沒有了，但偽自由書之類的雜感文裏，却表現着他的文字藝術的登峯造極，而影響也最大。

這樣的意見，對於他的思想和文字不可分的關係是說着了一部分真理的。雖然他的思想進展的各階段中仍有一貫的線索，並不是突然積極又突然虛無。然而在思想的波狀起伏裏他的文字的光輝也跟着波狀地消長，却是可以承認的事實。

是的，魯迅先生的思想經過了幾次的轉變和懷疑，經過否定又肯定。但轉變必然要有所以能夠轉變的基礎。同是一時的戰士，爲什麼周作人先生會走進苦雨齋裏，爲什麼林語堂先生來專談幽默？而魯迅先生却和前進的青年一道走？轉變不是魔術，而是現實，因此也要有現實的基礎，這就使得我們在魯迅先生思想轉

變前後各階段中，能找出一貫的東西。有人說魯迅先生雖然有豐富的思想，却沒有成爲系統。這樣的見解，只是指出了平庸的事實，却沒有道着了核心的真理。事實是魯迅先生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基礎用系統的方式舒寫出來，並不是說他沒有一貫的東西。戰鬥的思想家不斷地應付着許多遭遇戰，就只好教科書式的一體「著作，留給書堆裏的編纂者去做了。然而後者常只能復述，却少獨創。

一貫，是發展的一貫，不是靜止的一貫。魯迅先生在思想過程中曾跳過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從個人主義到集團主義，從人道主義到社會主義，從進化論到史的唯物論。他曾經彷徨，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看見了「集團主義的大蠱」，却找不到跨過去的橋梁；他終於跳了過去，承認了自己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魯迅中間，我們能找到什麼共同的内容呢？

最重要的一個共同的内容，就在他的思想的時代和社會的使命上。他的使命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所擔負的使命。他生在這一個國家，在這同一個現實裏長

大，他和中國的社會人物天天接觸，磨擦，他愛中國和中國人，因此也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缺點深惡痛絕，切望着他們的改善。他起來和這些缺點作戰，不是一個單純的戰士，而是民族的戰士。作爲思想家的他，就把這思想磨成了最適於民族戰鬥的武器。

從阿Q正傳裏就可以看出這位民族戰士的思想態度，阿Q正傳並不是不負責任的諷刺。魯迅先生給與阿Q的並不是漠不關心的嘲笑，他是抱着嚴父的慈愛的心情，看見了他的孩子阿Q的愚劣，孩子的愚劣使父親痛心到啼笑皆非，然而又禁不住要寄與深深的同情和憐惜。魯迅先生眼中的阿Q，其實也就是他眼中的中國人。無論中國人是否全像阿Q，無論現在的中國人比阿Q時代更有了什麼進步（這進步，就是魯迅先生自己也了解的），他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熱愛，希望，對他們的缺點的痛恨，是始終一致的。

「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一直到將死的前幾天他還是這

麼寫着。不錯，魯迅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也不是容易的，因為這不是在國籍證明書上掛一個名字的事，而是要能夠爲中國的進步和自由戰鬥，流血。魯迅先生是始終爲中國的進步而戰鬥着過來的。我們甚至可以承認知堂先生的話，說「豫才（即魯迅先生）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雖然知堂對魯迅的別方面的評判大都是胡說，而他所了解的民族主義也並沒有超過一個抽象的名詞。

用抽象的民族主義來形容魯迅先生的思想，那就等於說他是國家主義者或國粹主義者一樣，不僅只不適當，而且就是侮蔑。然而魯迅先生確實可以算得一個最勇敢的民族主義者，倘若我們從具體的，現實的意義上來解釋這一個範疇。具體的民族主義有種種，魯迅先生的民族主義（也是真正中國所要的民族主義）是被壓迫者反抗的，求生存的民族主義，而不是狂妄自大而喝血的法西怪物。同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也有立場不相同的，精神文明論者只求守着國粹的傳

統，但另外的人却要爭取人民的物質生活。魯迅所要求的也正是人民的物質生活，他是唯物的民族主義者，他最痛心的是阿Q的精神勝利術！

說魯迅先生是民族主義者，會使我們想起從前文藝自由和第三種人的論戰。民族主義者雖然並不是自由無礙的天使，但却頗有第三種人的嫌疑：它好像是爲民族而提出來的主義，並不是爲民族裏任何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說，魯迅先生既是民族主義者或愛國的人，他在這國家和民族內部就不會以任何部分集團爲立腳點，却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民族化的第三種人。

不錯，爲着全民族的出路和利益才有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者也有最勇敢和較勇敢的分別。最勇敢的民族主義者是和物質生活要求最切近的人民一致的，他決不會忘記整個民族的命運，因爲這也就是他的命運。他爲中國的整個民族的生存而戰，因爲他的生存也就繫賴於中國民族整個的生存。但無疑地，他是屬於最勇敢的民族鬥士的集團。

魯迅先生是一個一貫的最勇敢的民族戰士。這個「一貫」，就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基礎，就因為有這個一貫，他才能跳過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他是最勇敢的民族戰士，因此在封建傳統成爲中國民族生存的主要大敵時，在五四運動前後，他就和反封建的最前線的集團站在一道。他是勇敢的民族戰士，因此在正人君子把北京城攪得一塌糊塗時，他以個人主義的資格和他們搏鬥。他是最勇敢的民族戰士，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以後，雖然橫遭左翼方面的「圍剿」，然而看看中國的前途是擔負在苦痛的廣大民衆身上時，他也就忍着傷痛，辛苦地翻了個身，站到他們的集團裏來。傷痛中的翻身，是談何容易的事！倘若是僞君子，他必定瘋狂地揭去假善的臉孔，露出青面獠牙，然而他是誠真的戰士，爲着「遠大的目的」（知堂先生註釋說：『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救中國』），他就說着『投降也是常事』，走向大衆這方面來。

魯迅先生是一直向前走的。用自由人或第三種人的理論來看他自然不對，但

要把他嵌在一個死的固定的集團範疇裏也同樣不行，他是跟着時代的每一個重要階段趕上了前鋒。他生長在農村，有人就把他嵌進了『農民』的範疇，他的頑強不敗的戰績，就被人解釋成農民的執拗性使然。如果說魯迅先生還有農民性（也就是保守性），那麼，對於那從實驗主義和科學走向國故整理的胡適，農民性不是更十倍於魯迅了嗎？死守在苦雨齋裏談龍談虎的周作人又如何？自稱有點『蠻性』死活也要幽默的林語堂豈不更極近於農民？爲自己的主張而百戰不屈如果就叫做有農民性，那麼一切最勇敢的革命戰士都得到農村裏去找了。魯迅先生的不妥協的精神其實並不是來自農民性，恰恰相反，他和農民的愚昧的保守的傳統尖銳地對立着。他一點也不執拗，能在將近老年的時候跨過兩座思想的山峯的人，還算是執拗嗎？他不過是深深地愛着中國，對於他所信爲可以救國的思想把握得最確實，爲這思想的戰鬥也做得最堅決罷了。當他發覺了一種思想對於民族的生存有害時，即使曾經爲他所深信過，他也能夠毫不痛惜地『一脚踢倒』！

伊里奇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因為他在作品裏反映了俄國革命前社會各階層的動態。魯迅先生也是中國民族革命的鏡子。但鏡子的反映是有條件的，因着它所放置的地位和角度的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東西。魯迅先生是一面活動的鏡子，他依着民族生存的需要，屢次改換了自己的地位和角度，校正了自己的反映，甚至於不惜使自己犧牲。『爲了遠大的目的……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他有着這樣以身殉道的精神，但並不因此他就不愛自己的生活的。他愛民族，但他也要使個人的生活有意義；因爲個人也是民族的戰士。愛生活，也是魯迅先生思想中的一貫的東西。他的態度的嚴整，做事的不苟，就表現着他是怎樣地愛惜生命，不願有一刻空洞的濫費。生活的要求，本來是人的常情，不是變態的人，不會平白無故地求死。人都是愛生活的，不同的是各人有他所愛的方式。自私自利，偷安苟活，也是出於愛生活。用虛縵的美夢麻醉自己

或用誇大的狂想圖一時的快意，也是出於愛生活。然而這都不是真正愛生活的方法，前者是退縮，忍辱，庸俗的道路，只顧到眼前的小利，看不見生活的進步的前途。後者是輕浮，盲動，空想的道路，只耽迷於縹茫的幻夢，不能把握住生活的現實。魯迅先生所要的不是這兩種生活態度，他愛切切實實的現實生活，愛一步步勇邁地進步着的生活，對於那庸俗的和空想的生活抱着極大的厭惡。他的厭惡的對象結果成了他的戰鬥的對象，於是魯迅先生就不斷地在兩條線上實行着鬥爭。華蓋集和彷徨時代他痛擊過北京教育界的卑劣庸俗，被『圍剿』的時代，他雖然在遠大的目的之下看見了自己的錯誤，承認創造社的攻擊使自己『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是值得『要感謝』的，但同時他也批評當時左翼人們大都偏重口號標語的近於空想和不合實際。是的，魯迅先生在生活態度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都和過左的空洞思想以及右傾的俗物思想做過戰鬥，從這中間，產生了他的戰鬥的現實主義。

久經陣場的戰士並不能百戰百勝，中間也難免有失足跌倒的時候，偉大的戰士就在於能夠再接再厲。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就是在再接再厲的戰績中發展起來的，他的嚴肅的生活態度使他走上了這一個方向。他也曾經蹉跌，走上歧路。他曾經失望，感到虛無，曾經譯過阿志拔綏夫的虛無思想的作品，他曾經跟着廚川白村，謳歌過空洞的所謂『生命力』。然而他一點一滴地抓住現實，一步一步地走上前路，從反對精神勝利的舊唯物論思想，終於達到了科學的唯物思想的境地。從這樣的過程獲得現實主義的思想，是最艱難的，然而也是最切實的，最有活氣的東西。這思想雖然是因了『幾種科學的文藝理論』的一觸才飛快地結晶，堅定地成形。然而不搬弄生硬的外國名詞，不空喊高大的口號，活生生地和日常生活的事實結合着，這却是普通靠書本得來的現實主義所萬難企及的。

這戰鬥的現實主義，同時也是魯迅先生的思想方法。他很少談抽象的理論，却最善於分析事實，他甚至沒入到最日常的瑣事裏。他不用理論的公式去套住事

實，却愛從事實中找出具體的活的理論。自然，文藝是形象的現實反映，作爲一個文藝作家，應該都有具體地表現思想的能力，不是魯迅先生所專長的。但他的專長並不在於寫出事實，而是能巧妙地暴露事實的矛盾。他善於出人意表地點出事物的負面，因此在論戰的時候，也最能用論敵所說的話，去打擊論敵自己的嘴巴，呈出一幅諷刺的，幽默的，然而却是真理的場面。他沒有有意地在講辯證法，但事實上却有意無意地在隨時應用。從來天才的思想家都常常要跳出形而上學方法的禁錮，而對於辯證法的發展多少貢獻一些東西。這在魯迅先生，情形也是一樣的——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時也就給世界的哲學增添了彩色。

魯迅先生對於科學

周建人

魯迅先生不但愛好文學，曾做文學方面的工作，他又愛好科學，不少時間用在研究科學上。他在南京學開礦的時候，不用說，曾學習礦物學，地質學，化學以及數學等科學。到仙台去改學醫學時，又學習生理學，解剖學，有機化學等科學。這些學科是醫學的基礎，自己更讀赫克爾的自然創造史，阿·海爾脫維息的細胞學，梅契尼科夫的著作等。他不僅學習說明科學，又研究理論科學或生物哲學。這些書籍後來帶到他的北平的寓所，至今大概還存在那裏。

到了感覺到『中國的獸子，壞獸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決計放棄醫學，從事文藝運動的時候（參看許壽裳先生的懷亡友魯迅——新苗，第十一期），他研究文藝了，但研究科學的興趣仍然保存着的。回國以後，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

擔任生理學和化學時，除了研究職務上所擔任的學科外，又自己研究植物學。往西湖等處採集植物，親自壓製標本。他寫信給我，叫我也可以學學植物學，因為這很有趣味，也很重要，特別是沒有多大的設備也可以研究，材料又隨地可以採得。民國前二年夏季，他從杭州回來，把採集的標本帶回來，暑假中把未乾燥的加以整理，已乾燥的貼上台紙。這年秋季，他在紹興府中學堂擔任教務長，兼任博物學的一部分功課，還繼續採集植物標本。他住在學校裏，我去看他時，他常在做顯微鏡下的工作。就是直到他最後一次的病將發生的時候還預備買一台顯微鏡，已病的時候，還講起雪潑里著的顯微鏡下打獵的內容。他對於科學的興趣始終沒有衰。病中也還看生理學的書，說近代生理學的內容已和他當學生時學習的改變得大不相同了。

但到離開紹興府中學堂，任紹興師範學校長時，因為事務更忙，遂不再採集植物了，閑暇時却計劃出叢書，德文的書籍外，更買了些英文的，如家庭大學

叢書等叢書，預備把好的選出來，邀集幾個人來分頭去翻譯。但不久，他便往南京教育部，接着教育部遷往北平，他也就住在北平，出叢書的事情遂沒有辦成功。採集的植物標本，一直保留在家裏，直到遷居北平時，他回來接家眷，和他商量的結果，和我採集的一些一起送給本地的學校了。

大約民國十六年，他從廣東到上海，住在橫浜路的景雲里，不久便和我講起想譯法布爾的昆蟲記。他說在北平時會看過幾本法布爾的著作，覺得很有趣，把他的昆蟲記譯出來給青年看看是有益處的，所以應該找點閑暇來翻譯。但他沒有閑暇，他編奔流等雜誌，翻譯文藝方面的文章，又讀文學及社會科學的理論等書籍。並且搜集材料，想編中國文學史。但翻譯昆蟲記的事情並沒有忘記。生病以前的幾個月又幾次講起想翻譯昆蟲記，終於決定和我共同來翻譯。先去買英譯本，是預備給我參考用的。這書在他的病前和病後陸續寄來，但只到了十二冊，還有三本（其中一本是著者的傳），因為出版家已賣完，沒有寄來。他預備託人

向舊書店去買舊的。但不久，魯迅先生竟因自己也料想不到的這一病，在曙光將明的時候和我們永別了。中國文學史和翻譯昆蟲記和別種要做而沒有做或沒有做完成的工作遂都留給了現在活着的人和正在長大起來的青年們。

魯迅先生健康時和病中的時候，除掉講談科學方面的問題，帕扶洛夫的學說等之外，別的意見還很多，例如，在去世的數天以前，他講起印闍書，他說不知道的人也許以為他有閑，所以做這種玩意兒；實際上他印闍書無非想讀者珍重一點，留傳得久遠一點。講到章太炎時，他說他先前曾從事革命，下過幾次獄，但並不屈服，這種精神是應該學習的，但晚年的陳舊的思想却不應該學習。他以為好的批評者應該把他的優點提出來，錯誤的地方就說明他的錯誤，這也就是給讀者們指出一條正確的路。有時候他講起記們者記他的談話，不免有記錯的，比方，有一回，有一個外國的訪問者發表他的談話記裏，曾記着『我的兄弟是豬』這一語，他說完全不曾說，不知道怎樣寫進去的。在熱度很高的時候，他還看啓明

先生的著作，我去時，便坐起來對我說：他的文章有些地方的確悠閑得可以，但有些地方却並不是悠閑的，就是像且到寒齋吃苦茶這些詩裏說的『聽談鬼』這些話也並不是完全悠閑的話，還有別的含義。他幾次對我談起，希望啟明先生保存着像先前北京恐怖時代設法把李大釗先生的兒子護送出國的那種愛護青年的熱忱，不要走到消極的路上去。但是如果把這些談話寫起來未免太瑣碎了，將來或許要寫，或許不再寫，都沒有一定的。現在只寫了魯迅先生對於科學的興趣這一點，因為他的這方面的興趣，知道的人比較少，所以讓我說一說，別的話這裏不想多說了。

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

雲 韋

想用四五千字的筆墨，通過魯迅先生的作品去完整的解釋魯迅先生的寫作方法，在我不可能的，也不是一時做得出來的事。在我，以為假如我們能完全說明了魯迅先生的寫作方法，那就算說明了我國文藝寫作方法的戰鬪的傳統。這樣的事，是要準備給與相當的時間，更多的篇幅，跟着中國新文藝運動整個歷史的研究來進行的。我在這裏，僅企圖根據魯迅先生自己關於寫作問題的文獻，將他對於『寫作』的理解，做一個比較系統的說明。但也只能『提綱』的說明，並在寫作技術的問題上，恐一時還是不能觸到。不過我相信：如果是我的能力所可及的話，將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在一般的輪廓上做出一個比較正確的說明，介紹了他在寫作問題上的基本的主張，也還是必要。而且，對於我們現在是非常有益

的。

跟其他的問題一樣，魯迅先生的寫作主張，在目前的寫作理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中，一樣站在很高的地位上，值得我們嚴重的來注意，深刻的來研究，並忠實的來實踐的。跟其他部份一樣，魯迅先生在寫作問題上從頭到尾所抱的見解，是一貫充滿健康的。然而。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被我們應用起來的見解。

魯迅先生一開始他的寫作生活，第一就堅決主張寫作是爲社會的理論。在魯迅先生看來，既不是「爲寫作而寫作」，也不是爲「自我的表現」而寫作，而是完全從社會的見地出發，爲了社會的解放和平鬪爭而寫作的。在他看來，若不是這樣，寫作就簡直沒有絲毫的意義，他自己也毫無趣味來提筆了。他一貫的這樣主張着，實踐着，並且一貫的。在這見解上跟和這相反的人們作激烈的論爭。他說：

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

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閑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樣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三』年說的，所以說『仍抱着十多年前』的主張云云。確實，他在『一九二二』年，在他的第一本小說集的『自序』裏，就這樣表白了他拋棄醫學轉入文學的動機。而這，是日俄戰爭那時（一九〇四——〇五）的事了。他說：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看的便是來鑑賞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世界改變了，在這世界裏面的富有正義感的他也不能不改變了。於是他用着矯健的步伐前進。但他已不是同一的人，走的也不是同一的路，他已走上光明的坦途了。一九三〇年初，他就完全『轉向』（其實他從來就沒有走錯路）一個前進的文學營壘來，而成爲一個至死槍不離手的戰士。這是左翼最大的勝利。中國的新興文學，在擁有了魯迅這優秀的指導者之後，馬上統治了整個的文壇。中國新興文學的建立及其發展，魯迅有着最光榮的永不能磨滅的偉績。

在這時期裏，他寫了許多的『雜感』。敵人的迫害與戰鬥的緊張，使他不及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見解溶化爲藝術的形象，用小說戲劇的體裁表現出來。他只能採用了這一種最適於戰鬥，最便於吐露自己的憤怒憎惡或是讚美的藝術形式——雜感。魯迅是一個非凡的文體家，這匕首一樣的文章，不唯在歷史的戰鬥上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給中國的文學添了一種嶄新的樣式。現在有許多散文家便是在魯迅這種文體的孵養之下長大起來的。

……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然而，在那時，寫小說是不像現在也可以求『名』收『利』的。不唯不如此，在那封建的中國『學術』傳統下，簡直認爲這是文人的末路，因而是爲『社會人士』所不恥的行業。魯迅先生自己說得好：『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爲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自然，現在『小說』是高踞在『文苑』的寶座裏了。但那時的景況，却把魯迅先生完全出發於社會的觀點的，

澈底的，寫作的社會客觀的態度，刻劃得非常明白。這特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也是客觀的現實主義的最本質的寫作立場。

於是，從社會出發，爲了幫助完成社會的變革任務而寫作的他，在寫作方法上就必然成爲一個澈底的現實主義者。他嘲笑徐志摩的詭奇幻想（一九二四，音樂？——集外集）；他打擊成仿吾以爲表現現實人生的藝術是「庸俗」的主張

（一九二四，參看故事新編：序言）；他嚴厲的批評創造社等的「革命文學家」們不敢「正面現實」的，藝術的逃避，左傾公式的高調等（一九二八，文藝與革命；『醉眼』中的朦朧；——三閒集等）。他所要求的是「描寫現實」。並認爲要描寫現實，首先作家就要有「敢於正面現實」的勇氣。他說：

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壇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還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爲文藝家至

動的寫描……才會成功的。他在這主張上，第一個極明確的批評了『標語口號』的寫作理論的謬誤。他說：

美國的辛克來兒 (Upton Sinclair) 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一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也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荐』，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却並不全是文藝，正如一切花皆

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他是文藝。

（一九二八，文藝與革命）

然而，現實的真實的描寫應該怎樣來進行呢？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在一定的主題下把題材組織起來，不拘陷在粗糙不全的個別的題材下面。這是一。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Dostoiivsky)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

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一九二六，窮人小引——集外集。）

……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唯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一九三

一，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

不停止在人物意識的表面，還要深入其內容；不在『事實』的現象上打轉，還應該透視進去，暴露其本質。這是二。

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爲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自選集：

自序）

在現實題材的處理中，在表現上對於現實的肯定部份——前途發展的光明的強調。這是三。

可是，『組織』不是『歪曲』；『深入』不是想入非非；『強調』也不是『未來』的虛造。那樣，是魯迅先生所堅決反對的。事實上，他是一個極嚴謹的現實主義者。如像，在上面所引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中，他就告誡人不要『硬造』革命英雄。又說：『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得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九三六，現實文學第一期）中，他叫人不要『硬紮一個革命的尾巴』，來表示『革命』。特別是在一九二八的文藝論戰中，他不斷的發揮了寫作的不能『超時代』，超現實的主張（『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路；太平歌訣；劉其大觀；……）。

魯迅先生認為寫作並不是一件可以隨隨便便的事情，這中間需要作家們拋去自己利己的觀念，虛心，刻苦的學習，不斷的努力前進。然而他又不以為寫作是

高不可攀的事，要天生的才子們才有這資格。他不斷的打擊那般徒唱高調，亂殺亂砍，他叫做『輪板斧』的『批評家』。他尤其反對對於新作家的蔑視。他主張現。實。的。學。習。：寫不出自然不硬要寫（答北斗雜誌社問——二心集、一九三一）；但只要想寫，那有什麼就可以寫什麼（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等）。作品不是一寫就要『不朽』，作家不是一生下地就能『偉大』的。——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了一個『流產』的惡諺，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

萬不要動……

孩子初學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牀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他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一九二五，

流產與斷種——華蓋集）

寫作學習的『實事求是』的主張，也是魯迅先生一貫的主張。今年，他爲了對於田軍的八月的鄉村的『求全責備』，還大大的打擊着那般所謂『革命的批評家』們（參看夜鶯第三期：三月的租界）。而他在這主張下面的實踐（教育青年作家及藝術家），也是貫穿了他底一生，並在中國新文化建設中留下了他非常驚人的偉績。

將如上的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與現在國際的寫作理論相比，似乎也極『平常』：『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不是說，寫作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寫出真實來』麼？它不是爲了更廣泛的教育各種各樣的作家，主張現實的學習，反對『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理論的書呆子氣，以及牠的偏狹性，而強調『描寫現實』的意義，以『現實的努力表現』來求統一，以不斷的寫作實踐來求到達最高的寫作水準——唯物辯證法的去把握現實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不是也同時批判着布爾喬亞的現實主義，批判着他們早期的浪漫主義，將『現實』作爲動的，發展的，可以預見的（夢的現實）來解釋的麼？……這些都各各與魯迅先生的寫作主張吻合。但正因爲這樣，我們才看出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的價值，才深深理解，在他這裏，就是寫作理論也是一樣堅實的，完整的，和光輝的！

上面雖僅是提綱挈領的引錄，然而看那些引錄下面所註明的日脚吧。歲月的記錄證明：魯迅先生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三六，也就是從他文學生活的開頭到煞

『正確』。與其左右爲難，不敢動筆，不如有什麼就寫什麼，能怎樣寫便怎樣寫，而在實踐的鍛鍊裏求精進。當參加『第三種人』論戰時（一九三二），他大膽的（然而不是正確的）向『第三種人』的蘇汶說：是的，你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不如你還是去寫你的吧。（論『第三種人』——南腔北調集）

歷史一頁一頁的揭開，在寫作理論上，我們也同樣理解到他完整的偉大的光輝了！

一九三六，十二，三——四日

魯迅的雜文

徐懋庸

「雜文」這兩個字，現在是成爲一種短文的專名了，含義裏面已經沒有什麼惡意，但在首先用這名辭的人，這原是一個不好的名字，因爲這個「雜」字，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向居於被輕蔑的地位的，「雜戶」，「雜流」，「雜家」，「雜種」，「雜技」，「雜學」……都不是正牌子的東西。後來到得正人君子們的手裏，這更成了一個「惡諺」。對於魯迅，早年北京的正人君子們曾送過「雜感家」的名稱，因爲那時他常寫「隨感錄」。後來上海的正人君子們一看這不對了，因爲他所寫的短文，實在不只限於隨感，也有學術論文，也有文藝批評，也有抒情散文，也有散文詩……「雜感」二字，不足以一網打盡，於是改用「雜文」

兩字，從此有『文』皆『雜』，都成爲『雞零狗碎的非真正的文藝作品』，一無足取了。

後來成了專名的『雜文』，範圍却沒有如此之廣，那還是指『雜感』而言，關於這種『雜文』，魯迅曾經說道：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 *Tsu-ven* 的東西。這真要使有志於成爲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尙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尙的文學樓台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列爲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爲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離騷』並列了。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爲有人說牠近於英國的 *essays*，有些人也

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打雜集序言）

這類雜文有沒有『侵入高尙的文學樓台』，我們且不去管它，但至少魯迅的雜文，雖然有人以爲最好應該選一下，其有『文藝價值』，則已不大有別的什麼異義。然而，魯迅自己實在是不大計算這個所謂『文藝價值』的，他所看重的乃是『社會價值』。曾經有這樣的事：我的『打雜集』出版之後，張庚曾在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上發表一篇批評，說的是作者的文筆如何如何，魯迅看到，就將這篇批評剪下寄給我，在旁批着道：

這篇批評，竭力將對於社會的意義抹殺，是歪曲的。但這是『小公園』一貫的宗旨。

張庚並非『小公園』中的人物，只是一個在外的投稿者，他並不遵守『小公園』的宗旨，而且也毫無『抹殺』對於社會的意義的意思，他當時只因對文筆說得多了一點，就沒有工夫再多說關於社會意義的話罷了。魯迅說他存心『歪曲』，實在是誤會的，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於社會價值，是怎樣看重了。

倘爲什麼『文藝價值』或『學術價值』計，魯迅何嘗不可以把他的所有的雜文分一分類，於短評之外另編幾個『抒情文集』『文藝論集』來和別的文學家們爭爭短長。『爲了忘却的紀念』那種文章所具有的文藝價值，『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種文章所具有的學術價值，恐怕是難以『抹殺』的罷。然而魯迅實在很古怪，他自己也竟將各體的散文『一古腦兒』編在雜文集子中去，在『二心集中』，甚至於也收了一篇譯文。這真成了夾夾雜雜。這並不是對於上海的正人君子們的雜文界說的諷刺，而是他自己的寫作態度的表明。他是凡有寫作，連有的翻譯，雖然體式不同，題材各異，但總要使其對社會有鬥爭的意義的。他不

想住『象牙塔』，也不想進『學士院』，他把文藝性，學術性的作品，也擺在『十字街頭』，兼做鬥爭的武器。李長之說：

魯迅的雜感集，自一九一八寫的熱風爲始，沒有一年停過筆，到現在止（按，這是一九三五年的話），是在十餘冊以上了。就中正式的雜感集便有九個，就是：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包括了雜感論文，合而爲一，但大部分仍是雜感的，是；墳；名爲詩，其實不過是凝鍊的雜感的，是；野草；名爲散文，其實依然不過是在回憶之中雜了抒情成分的雜感的，是；朝花夕拾；爲魯迅自己所有意或無意刪却，又經別人集起來，稱爲集外集的，其中有幾首詩，有幾則編輯後記，但大部分，也還是雜感。（魯迅批

判）

這一段話有的地方有點古怪，但也說着了一種實在的情形。古怪的是李長之竟把『雜感』看成了一種固定的化學原素，性質又如此難以化合，攙在別的文體中還要使人看得出其爲『雜感』。我想，一切文藝作品，總是有感而發的，沒有感想，怎麼會有『論文』，沒有感想，又怎麼會有『詩』與『散文』？普通的所謂『雜感』也者，乃是那些所感本極瑣碎雜亂，隨筆寫出，所以形式也很隨便的短文。但在魯迅，雖是短短的『隨感錄』中，感想也並不瑣碎雜亂，至於許多論文，筆路似乎散漫，其實組織很是嚴密，拉扯了許多瑣事，却一貫以系統的思想，所以決不能說是『雜感』。至若所感的既發而爲詩，那就成了詩，發而爲散文，就成了散文，爲什麼一定還要說它們是『凝鍊的雜感』或『抒情成文的雜感』呢？此說若通，則李白拜倫的詩何嘗不是『凝鍊的雜感』，高爾基的在人間何嘗不是『在回憶之中雜了抒情成分的雜感』呢？李長之因爲太愛把『雜感家』

的名稱送給魯迅了，所以把『雜感』兩字的含義擴大，差不多就等於『思想』，雖然用意與正人君子們不同，但怪論總是怪論。

但他也說着了一種實情，就是，魯迅的論文以及詩和散文，也跟他的短評一樣表現着他的一貫的思想，發揮着他的辛辣的批評，準對着他要攻擊的現實。他的寫論文，並不是爲了要得博士學位，學者銜頭，他的作詩，並不是爲了要附庸風雅，甚至於他寫憶舊的散文，也不是爲『憶舊而憶舊』的，這的確是魯迅和別的無『感』而作的作家不同之點，而正是他自己的一切作品所共通之點。

因這共通點，魯迅也就自認他的小說以外的各體的散文爲『雜文』，而『雜文』之名，因此倒輝煌了起來。

魯迅的將一生大半的精力用於寫『雜文』，並不是沒出息，也並不是患了欲能不能的『死症』，他是，實在從『雜文』這種作品裏發見了『掃蕩穢醜』的力量，而有意提倡，實踐的。他不但自己做，並且也介紹。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

塔和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尤其是前者的翻譯，對於中國的雜文的發達，影響之大，恐怕並不在他自己所作的雜文之下的。

他又從中國的古籍上，探尋現代的戰鬥的雜文的淵源：

……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場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鏘。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却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小品文的危機）

為『諷刺』，為『攻擊』，為『破壞』，總而言之，爲了『掃蕩穢醜』。魯迅

創作了他的雜文，並且促進了中國的雜文製作。他知道自己的一把掃帚不夠，所以他用了種種方法，教會多數的青年們，大家都使用「雜文」的掃帚。

魯迅所倡導的雜文運動，是現代中國思想鬥爭上一種重要的武器的生產和使用。

二

對於魯迅的雜文中的思想，何疑有過很中肯的批評，就是那魯迅雜感選集的序言。那上面說：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

歷年的戰鬥和劇烈的轉變給他許多經驗和感覺，經過精鍊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這些革命傳統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

第二、是一朝一的戰鬥……

第三、是反自由主義……

第四、是反虛偽的精神……

自然，魯迅的雜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不過爲着文藝戰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在思想鬥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着他前進。

魯迅的雜文中所表現的精神是如此，我們應該學習他，這是毫無問題的。但

在事實上學習魯迅的人們，倒是學習文章的技巧者多於學習思想精神者，而且我知道有些『魯迅迷』竟是反對着魯迅的思想，而只欣賞他的文筆的。這種現象，自然是魯迅的文筆的特色所致。但是魯迅的文筆的特色是在那幾點呢？

我所能舉出的是如下的幾點：

第一是理論的形象化。魯迅的文章裏面，是很少抽象的議論的，他利用豐富的生活經驗，淵博的學藝知識，批評人事，能夠替任何道理舉出實際的例證，以小喻大，因著顯微，又舉得非常自然活潑，不像蒙丹臬(Mondayne)的隨筆中的羅列典故那樣的可厭；我只見高爾基的論文，也有這個特色。這是得力於『見得多』，『記得牢』，『了解得深刻正確』這三點的。

第二是語彙的豐富和適當。魯迅曾從章太炎學過小學，又多讀古書，所以對於中國文字的理解很是正確，語彙又記得極多，所以使用起來能夠多變而適宜。用成語古典能化腐朽為新奇。這事曾給施蛰存做了勸青年讀莊子和文選的理由

之一。但魯迅自己，只承認他的文章是『改革道上的橋樑』，不是新的目標和範本。他的曾讀古書因而能利用古書，是他的時代使然，現代的青年，在這一點，却無須學他，而且是不易學到的。現在我們要能豐富語彙，而且能適當使用，應該將現代的『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去汲取，去練習。

第三是造句的靈活。這是古文的影響和外國文的影響融合的結果。用文言文而使人不覺其陳腐，用歐化句而使人不覺其生硬，新鮮而圓熟，並且音調流暢，可以朗讀，所以特別有味，但跟口語相差很遠，所以魯迅的文句，是不合大衆語文的準標的。

第四是修辭的特別。因爲目的是戰鬥，所以魯迅竭力要使他的文章的效果增強，而在修辭上特別用工夫。『然而呀，這裏用得着然而了』，『又要然而了，然而……』，『鋪張』或『揚厲』竟做到這樣；特別善於利用『引用』，對於別人的文章只要用『』一勾，再輕輕一戳，就給暴露出破綻；至於常用『死話』，

『冷話』，『倒反』，『暗示』之處，竟被人們認作是『紹興師爺』的特色。

還有是行文的曲折之多。關於這一點，李長之曾說：

誰都知道魯迅的雜感文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倘若說出來，就是他的筆常是擴張又收縮的，彷彿放風箏，線鬆開了，却又猛然一提，彷彿開水流，却又預先在下流來一個閘，一張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種快感。讀者的思想，先是隨着馳騁却終於兜回原處，也即是魯迅所指定之所。這是魯迅的文章之引人入勝的地方，却也是他佔了勝利的地方。

他用什麼擴張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雖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過』，『譬如』，……他慣於用這些轉折字，這些轉折字用一個，就引人到一個處所，多用幾

個，就不啻多繞了許多灣兒，這便是風箏的鬆線，這便是流水的放開。可是在一度擴張之後，他收縮了，那時他所用的是一個：『總之』。（魯迅批判）

李長之引了華蓋集續編一九四頁第六行到一九五頁第九行的文章爲例。但他的解釋實在有點毛病，照他說來，魯迅的行文的曲折好像是有意繞灣子，在原地方一張一弛。其實不然，魯迅用的是『剝筍』式，他要暴露一個問題的真相，就動手把它的外面所有的皮依次剝去，剝了一層，『然而』還有一層，『不過』這一層樣子不同了，『如果』剝進去，那還有許多，『倘』不剝完，就不會看出真相，這樣的一層層的剝進去，最後告訴你『總之』真相如何，這就是深刻，像羅螺一樣，愈繞愈深入，並不是平面上的兜圈子。

但這種現象，不關作法，其實是思想方法所產生的。魯迅的思想方法，是合於辯證法的，就是，他不照呆板的邏輯，把問題放在孤立的狀態中去思索。他把

凡和這問題有聯繫的方面都想到，而且從它的發展狀態中去想。我們倘不了解這一點，單是從「然而」，「總之」這些字面的轉折上去欣賞他的文章而且去模仿他，那是沒有好結果的。無謂的繞圈，只能使人眼花撩亂而已。

最後，我要說一說一件很可注意的事，那是魯迅作雜文的態度。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魯迅作雜文的態度，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他常常站出『我』，說出『我以為』來。他自己還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華蓋集續）

編）。

並且，人們以為魯迅最厲害的地方是攻擊個人，有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為證。

這是實在的，但並不盡然。要明白這事的實情，我們得把魯迅所有的雜文集按着年代，順次地看一下：

最初的一本熱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所作——這裏面的文章，沒有講到自己的私事，也不講別人的私事。

墳的前面一部分，全是正面的論文，創作的時代或比熱風還早，或較稍遲，一九二四年以後所作的後半才有談自己的私事的文字。

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說自己私人和攻擊別人的陰私者特多。這兩書的文章，是一九二五二六兩年中所作的。

而已集和三閒集，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作品。這裏面講私人私事的文章比較少了，但作風還偏於諷刺。

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書中，完全從私事上談自己和別人的文章，簡直絕無僅有，而且積極立論的長文很多。在二心集的序言中，他還說過這樣的話：

……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此後就只有在一九三五、三六兩年，病後和將死之前，寫過幾篇說自己的生
活的文章。

這現象是有重大的意義的，我們知道，魯迅寫熱風中的雜文的時候，正是新青年時代，那時他是一個在集體中的鬥士，如他自己所說，凡事是『奉將令』的『遵命文學』，一步調是和大家一致的。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了，於是他成爲孤獨的鬥士，他曾經這樣的述說當時的自己：

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回同一戰陣中的休戰，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所謂『小說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脫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

新的戰友在那裏呢？我想這樣下去，是很不好的，……（自選集序言）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在這樣的獨自彷徨中，就產生了華蓋集和華

蓋集續編中所表現的那種戰鬥，所蒐集的那種文字，一離集體，就格外覺得自己，而且只見個人的對象，這是極其自然的。這樣的直到一九三〇年，他才又成了集體的戰士，因為這集體更進步，更廣大，鬥爭更猛烈，所以二心集中的雜文就成了『不是匕首，而是大砲，文字已脫却尖刻，變為傾注的光景，深厚多了』。從偽自由書的時代起，~~環境~~環境關係，又遞於做尖刻的短評，但所表現的仍是集體的意志並無私人的影子的閃爍。

這是對於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教訓：凡人，當他是孤立的個人的時候，和他是集體的一員的時候，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魯迅與民族解放運動

漢夫

一 辛亥革命前

「魯迅是萊謨斯（註），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魯迅雜感選集中何凝序中語。）

魯迅自己說：

「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

（墳：寫在墳後面）

魯迅「在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能力。」「但是到十三歲

時，我家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

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集外集中自敘傳略）

魯迅十三歲時（一八九四年）正是甲午之戰的那年，也正是興中會起來的那年。他在這年，從「不很愁生計」轉而爲「幾乎什麼也沒有了」，甚至於被人稱爲「乞食者」。到了十八歲時（一八九九年），已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年），他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空前）。半年後，改進礦路學堂。畢業後，派赴日本，決意學醫。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一九〇三年）；因此又覺得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在二十九歲時（一九〇六年），因爲家庭經濟需要幫助而回到中國來。

魯迅和農民有比較鞏固的聯繫。他出身士大夫的家庭，但是他的家庭的敗落，使他『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何凝）。使他感覺到縱然是親戚，在你什麼也沒有了的時候，也要稱你爲乞食者。這裏就使魯迅在兒童時代就培育了對奚落和冷潮——這宗法社會給他的（給乞食者的）奚落和冷潮的反抗心。而甲午之戰，戊戌變法，庚子事件（一九〇〇年），日俄戰爭等都給魯迅莫大的影響。中國應該『變』，應該『用科學來變』。他入水師和礦路就是要學科學。他在日本學醫，『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自敘傳略）就是他想去德國，也正是因爲德國的科學發達的緣故。他曾『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全前）。正是因爲被綁的中國人，『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精神。』（吶喊序）所以，魯迅覺得提倡科學固然要緊，但是麻木的精神，被宗法社會束縛着的精神，如果不得解放，就是有科學，有強壯的體格，

也不會對民族有何裨益。何況麻木的精神就是阻撓科學的提倡的。因此，攻擊宗法社會，解放人民的精神成了應先提倡的了。而且還應該用『新文藝』。『八股文』等等只有使麻木的精神更麻木，他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的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不自覺得。』（墳，論睜了眼看）所以只有新文藝才能解放麻木，使人民有反抗和前進的戰鬥精神。魯迅以為思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第一步。

魯迅在一九〇七年（二十六歲）時，在文化偏至論就攻擊時政，號召反抗。在摩羅詩力說中更說要『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在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域外小說集中，也特別注意叫喊和反抗的作品和被壓迫民族的作者。

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就立意以科學反對復古，以叫喊和反抗來改造麻木的精

神，以新文藝爲動作的起點。

二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後

迫於家庭經濟的需要幫助而回國，固然是不得已，但是，却也提早的給魯迅以實現他的志願的機會。

魯迅對辛亥革命時的意見是：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兩地書一九頁）

當然，魯迅只是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而並沒有認爲辛亥革命已經推翻宗法社會。實際上，排滿算是達到目的，但是，封建思想仍然濃厚，民治並未實現，科學仍未能『昌明』，袁世凱的統治並不見比滿清高明。所以他接着說：

『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兩地書一九頁。時爲

一九二五年）

所以弄到這樣壞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中國沒有澈底的改造。沒有將改造深入羣衆，沒有使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成爲羣衆的。如果革命而與國民無關，那只是紅臉進白臉出的換朝代，而不是民族的解放。魯迅說：

「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全前）

魯迅認定了民族解放要緊的是換「貨色」。所謂換貨色，就是反對封建，爭自由，改造國民性。魯迅在此地沒有特別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怕也不是他的忽略。因爲他所着重的是怎樣改造國民性，準備足以反帝反封建的國力。

但是，魯迅的參加思想革命：是在『五四』時代開始的。『我們說他的「參加」開始，是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什麼可以參加的，他還只能夠孤獨的「沈思」。而在新青年發動了「新文化」鬥爭之後，反國故派方才成爲整個的隊伍。』

（何凝）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敗後是『壞而又壞』，魯迅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到他在新青年寫文章的時候爲止，國際和國內都有了幾樁值得注意的大事（新青年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的。魯迅在新青年寫文章是在三年後的一九一八年）。國外的，有歐洲大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國內的，二十一條的簽字，袁世凱的稱帝，張勳復辟，中國參加歐戰和戰勝的歡呼，南北的對峙和北京政府的黑暗如昔。

魯迅認爲封建軍閥，官僚買辦是要竭力維持一切的國故的。如『宗法社會的舊道德，忠孝節義和腐爛發臭的古文化』。而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醜劇的一

再出現，也證明了排滿容易，改革國民的壞根性就『不肯了』。也就是說，不掀起廣大的反封建復古的運動，無從有澈底的改革。魯迅也認為歐戰的勝利並不是中國的勝利，對這勝利並不值得狂歡，倒要反省才是。而十月革命和陳獨秀創辦的急進的新青年，必然的對於富於叫喊和反抗的魯迅有着很大的影響。

魯迅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向封建文化做猛烈的攻擊。他說：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自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熱風：雜感三十三）

這是斬釘斷鐵的說出了救治不在復古和神靈，而在真正的科學。這是對症的藥方。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纔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全集第二十六）

要科學和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和思想，就不能靠經驗。主張只要經驗反對理想的人們，是『衛道』，是『存古』，是維持宗法社會。因為，這般人的經驗『使是從清朝得來的』。所以他們喊『中國與衆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正是反對科學和進步思想的一道護符。奴才主持家政，本來那裏會有好樣子，就是在孔聖人張天師的外表塗上一層洋漆，『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全前第四十八）也不過是爲了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同樣是應該反對的。『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爲世界雖然不小，但徬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全前第五十四）

但是，在辛亥以後，這種單重復古，二重思想却盛行着。『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這還不說，『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種黑暗的統治，殺人的宗法社會，『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他便殺了一將

來」。(熱風；現在的屠殺者。)

對這種社會再不反抗；民族真是要「國亡種滅」了啊！

魯迅在批評那些在歐戰結束時表示「人道這句話是廢人的」時，曾竭力要大家能「不滿」。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着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空前：不滿)

「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却幾乎全無用處。」(空前：恨恨而死)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踏踐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

的。(空前：生命之路)

魯迅這些說話，不是『心理建設』之類的東西，而是感覺銳敏的導師，向人們，特別是青年們指出中國的病症的來源，病象和對症的藥。這不僅根據魯迅的經驗，還根據他的理想，他是從現實中鍛練出來指示出現實中的生命的路。要人們，特別是青年們，從沒有路中踏踐出路來，認識『荊棘』，從『荊棘』中開闢出路來。這，非要認識『現在』不可，更非有對將來的『現在』有理想不可。這的確是從理論和實踐出發的。

『五四』運動雖然是直接起因於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置，是帝國主義犧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結果，但是這不可否認的是國故派和歐化派，『德謨克拉西』及『賽恩斯』的聯盟和封建復古，『不滿』『生命的路』和『衛道』『死亡的路』的鬥爭的一個爆發，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次偉大的表現。這，是和魯迅在『五四』前的言論，新青年一派人的言論是有密切關係的。這是改革國民的壞根性的過程中的

有。力。的。成。就。的。表。現。

魯迅說：「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熱風序）但是，他之所以不寫文字，恐怕還是因為「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全前）而且後來的情形和「五四」那時並沒有大兩樣，所以以前對於時弊的攻擊，也還可以保留。在魯迅看來，五四時的革新運動「表面上却頗有些成功」，實際上，後來和「五四」前後並沒有大兩樣。所以，以前所說的，仍然有效，而是應更加努力。我們如果能在「五四」後，仍不斷的得到魯迅的指導，當然就更應正當而迅速的從「荊棘」中闢新路了。這是我們至今還感覺到的憾事吧？

但是，魯迅並沒有停滯，在吶喊裏的小說，和對「國學家」而發的短文，仍

是。攻。擊。封。建。文。化。和。暴。露。舊。社。會。的。

三 五卅·三一八·和大革命的開始

「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經了已經披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何凝）

這時期有過反英帝國主義的省港罷工，有國民黨的改組，國共的合作。廣東在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下已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這個堅強中心的建立，影響到全國的工農大眾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中山先生的北上，使他的主張和政策，席捲了北方的民衆。中山先生雖去世，反帝反封建運動却仍繼續的猛烈的開展。隨上海工商學界的不可遏的反帝運動怒潮，發生了五卅慘案。在北京，段祺瑞在國民軍驅逐溥儀之後，做了臨時執政。隨北京民衆反對

帝國主義封鎖大沽口的運動，發生了執政府前民衆流血的「三一八」慘案。在革命中心的廣州，已經成立了國民政府了。在偉大的大革命時期的開始中，民衆和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的鬭爭，是日趨激烈。

『叫喊』——『反抗』——從荊棘中開闢生路——的魯迅是更興奮更努力的『叫喊』和『反抗』了。五四時代的一部分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的學究，隨着衛道先生們的沒落，而投入黑暗統治的懷裏去了。

魯迅叫喊着（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間）：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又說：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三）

不錯，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聯俄，反帝罷工，反帝示威，思想的解放，民主自由的獲得，國民政府（廣州）的成立，黨軍的訓練，都是『從新做過』。這『從新做過』是以農工商學兵的各階層的聯合的姿態出現的，是從羣衆的（改革着壞根性的羣衆的）反帝反黑暗統治做起的。

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認清了和根據了現實，號召和指示青年來參加和推進偉大的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

這時他不僅反對封建的『中庸』，也反對資產階級的『費厄潑賴』（Fair Play）。這時，主張『中庸』和『費厄潑賴』的人們——復古派和披了五四化的衣服的哥倫比亞的學究，是脈脈相通的在助長『國學』和『衛道』，是在維護黑暗勢力啊！魯迅認爲聽天任命和中庸的根柢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一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華蓋集致旭生先生書）他的著名的『打落水

狗』(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就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妥協主義的宣言。反對國故和衛道，反對黑暗勢力，應該澈底！不能夠因為披了新衣而復活，就認為又是一等人了。魯迅喊：『要打就得打到底。』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空前之六)

『死於敵手之鋒刃，不足悲苦……』(華蓋集·雜感)

這種的戰鬥精神，無疑義的鼓勵了不少青年。可是魯迅絲毫沒有忘記叫孩子們提防着『怯』者的『鋒刃』。從女師大風潮時那些卑怯的『中庸』和『費厄潑賴』的先生們的橫暴，『三二八』時他們的幫兇看來，先覺的魯迅的絕早的提醒，是很可欽佩的。他早就說：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全前）

魯迅時時刻刻指示青年，反帝和反黑暗統治是不可分的。時時刻刻要青年在一致對外時，提防幫兇和鬻手。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面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市民，屠殺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一）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兇險。爲「排俄」復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全前）

魯迅要青年人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看看我們究竟有着怎樣的「同胞」』。

「即使所發現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現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鬪的。」（全前）

魯迅要青年們去「創造」去「和黑暗戰鬪」。說：「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如果能「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就可以他們的「生力」，將深林闢成平地，在曠野栽種樹木，在沙漠開掘井泉。要緊的是不單空手鼓舞民氣，還同時設法增強國民的實力（聯合起來！）而且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因為，「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華蓋集：補白）如果能永遠這樣幹下去，「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全前。）

魯迅在這時期，不僅對青年給了這些指示，還親身參加了反對黑暗，反對和

黑。暗。勾。結。的。披。了。歐。化。衣。服。的。那。些。西。洋。國。故。派。的。學。究。的。鬪。爭。他。是。站。在。工。農。民。衆。的。陣。營。和。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作。戰。

女師大的風潮，起因於楊蔭榆任校長——這是一位和陳西澧等現代評論派的人同類的歐化的賢妻良母主義者——和章士釗的『整頓學風』（這又是一位國故派而在歐洲燙過金的。現在正在做冀察政委會的不小的官呢！）。一整頓學風——當然要用軍警毆打，老媽幫兇，和一切卑鄙和高壓的手段。反對國故和西洋國故的學究，當然要反抗。前者和壓迫不可分，後者却又和反抗不可離。

魯迅當然是站在後者的一方。陳西澧等『正人君子』的譏笑辱罵和明槍暗箭，章士釗（時任教育總長）的革魯迅的職，都沒有能損害魯迅的絲毫，只有顯出陳章這典型的恐懼無力，他們的黑暗和惡毒。魯迅絕不停止對他們的暴露和攻擊。他痛快的罵這些『媚態的貓』，『比牠主人更惡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何疑先生說的很對：『揭穿這些卑劣，懦怯，

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爭之中不可少的陣綫。」（魯迅雜感選集序）

「三一八」的北京的羣衆反帝運動，給魯迅以比「五卅」更大和更深的印象。這不但是因爲五卅慘案一般的給北方民衆的興奮比較給上海的差，這是有不少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的。同是也因爲魯迅在北京，對「三一八」事件看得更清楚，而「三一八」的幫兇，正是魯迅曾經堅決的和他們鬪爭過的一羣。

魯迅是怎樣的描寫段祺瑞在「三一八」的屠殺啊！

「如此殘虐陰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就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倒有一點相像。」（華蓋續集：無花薔薇之二）

魯迅又是怎樣的痛罵當局啊！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高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

心讀書的，而時局飄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該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企前）

魯迅在那時已經看到大革命的到來：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魯迅在「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的預言，就有大革命的急劇發達證實。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只覺得大家沒有更早的和魯迅似的打擊現代評論派的這些『正人君子』！他們在『五卅』時無恥的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徐志摩）。這些『媚態的貓』，大聲疾呼的說『五卅』慘案『要公正的』調查團先調查了事實再說（這些費厄潑賴先生們覺得中國人是應該被英捕打

死的)。女師大風潮時也是黑暗的維護者。到了「三一八」時，又說「執政府前原是一死地」，……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以「討赤」自任的說青年是該死的。魯迅說：『我還欠刻毒』。是的！我們還欠刻毒。

魯迅已經不僅是攻擊封建文化和暴露舊社會了。他在不斷的，一步逼緊一步的，短兵相接的和黑暗勢力作堅強的鬪爭，指示從『荊棘』中怎樣開闢出新路來。他是有偉大的人格和戰鬪精神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他的犀利的文章，使黑暗勢力發抖，使光明前途照耀，成了黑暗的照妖鏡，光明的指路牌。——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繼續戰鬪者應該以別種方法戰鬪了！——革命。

四 大革命中

『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牠，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北伐開始了。這是革命。魯迅對革命有那樣的了解，對革命自然有很大的熱

望。正當他在北京被黑暗勢力和『正人君子』嫉恨而和其他四十九人被通緝時，他南下了。到靠近革命策源地的廈門。

魯迅對北伐軍事的勝利是異常關心的。兩地書第二集中的通信，有不少報告北伐勝利的消息，這些消息，是『極快人意』的。

但是，到了廈門，還看得見『胡適之的信徒』、『現代派』的人物。本來，這些都不是『人』的問題，這是有社會基礎的一個階層啊！魯迅在廈門就沒有和在北京似的向這羣人做鬪爭——雖然也曾寫過文章演講，但是沒有和這羣人正面的尖銳的衝突。他說：

『我想這實在難對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輩周旋，就必須將別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機，本業拋荒，所得的成績就很有有限了。』『現代派』學者之無不淺薄，即因分心於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兩地書）

魯迅不願『分心於此等下流事情』。可是，『現代派』却又要猖獗了。

他於一九二七年一月離廈門到廣州。他目睹的革命策源地，已經和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和北伐開始前後的廣州不同了一些。

他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聯合戰線，再向舊社會進攻。』（兩地書）可是，到廣州後，『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現象』。（三間集）

他沈默了。『但現在沈默的原因……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而已集：答有恆先生）

他又『聽說他們（陳源「西滄」教授之流）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即章士釗），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空前）

願頡剛教授也說要去廣州，要他『勿離廣州，以俟開審』。他所反對的攻擊的，一個偶來了，當時的革命策源地，怎使他不失望？接

着，他作序，不能用了，他題的簽，也撤換了。魯迅二字在報紙上不允准再有出現了。有人還要他和他曾攻擊過反對過的一羣人合作。再接着，牽牽連連的「瓜蔓抄」盛行，使他覺得「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樣難。」（兩地書序言）禁不住要喊一聲：「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麼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累紕之憂』了。」（而已集：通信——致小峯書）那些「歐化紳士和洋場市僧，後來就和『革命軍』結合了新的幫口，於是僵尸統治，變成了戲子統治。僵尸還要做戲，自然再可怕也沒有了。」（何疑）

魯迅是沈默了。但是沒有停止對英帝國主義和牠利用來統治殖民地的孔教和復古的攻擊。在而已集和三間集中有不少篇雜感是爲此而發的。

廣州清黨，寧漢分裂。魯迅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本文也不便多說了。

何疑先生說：

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傾向的。他們看見到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的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是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着革命的價值。這對魯迅在廣州和離廣州後的批評，是再正確不過的了。魯迅看到了恐怖，可沒特別注意到荆棘中可以有新闢的路在。所以，常常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何凝）

五 革命失敗後

但是，魯迅對於革命並沒有失望和悲觀，他在荆棘中，尋找到了新的路出來。他看到新的黑暗，可是，黑暗中顯出的新的光明，是更光亮了。

正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他才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

解放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鬪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何凝）他現在更清楚的見

到在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之外，正在發展着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他說：

「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

這些「事實的教訓」正是指新的黑暗的兇殘卑鄙，新的光明的輝煌照耀。此地當然不必多說。

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武臣進到無產者和勞苦大眾的真正的朋友，以至於戰士的魯迅，只有使黑暗更遭痛擊，使光明更照大眾！

魯迅在這時期參加了自由大同盟，組織並領導了左翼作家聯盟。魯迅是戰士，是戰地的一個堅強的指揮。

他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詞中所說的一切，是對每一個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人的指示。他說：

『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是容易做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

今後應注意的幾點是：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

『第二：戰線應該擴大。』

『第三：應當造成大羣的新的戰士。』

『最後：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爲必要條件的。』

這些寶貴的指示，那個人能忽視呢？爲了革命鬭爭，爲了民族解放，這些不都是完全正確的原則，都是每個戰士不能一刻遺忘的指針嗎？

這些話是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間說的。『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二心集序言）但是，魯迅並不畏忌，畏忌的倒是舊社會和黑暗勢力，魯迅也不像先前那樣單單不滿於現狀，也不祇於和黑暗奮鬥，魯迅已站在有將來的新興階層這方面，努力於『造成大羣的新戰士』，『注重實力』，『擴大戰線』，對舊社會和舊勢力作堅決的，『持久不斷』的鬭爭。魯迅堅決的相信，這是民族解放的唯一的出路。

正因為如此，他更不斷的暴露黑暗勢力的殘暴，攻擊新月派的無恥，揭露『民族主義文學』實質。只要去讀魯迅在這時期的雜感短評就可以知道。不必多引。

魯迅在大革命失敗，黑暗籠罩全中國，而在黑暗中已見了新光明中，做着那樣準備持久戰的戰士的工作，使「九一八」——「一二八」時的黑暗更盡情的普遍的暴露，也使那時的反抗中有了更多更堅的戰士。「九一八」以後的雜感，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鬥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何疑）

他曾反對不抵抗主義。也曾反對對學生救國運動的侮蔑和壓制（請參看不三不四集 即偽自由書）：崇實，戰略關係等篇），他曾反對失敗主義（請參看同書：對於戰爭的祈禱），他曾反對李頓報告書和作為這報告書根據之一的「中國人自己發明的一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的國際合作學說（見伸冤），和刀槍下的媚外的「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全前），他在「以夷制夷中揭開了「以華制華」的黑幕」，他在安內與攘外（被改為文章與題目！）中說明攘外必先安內的只安內而不攘外，在天上地下中則已經指出了「共同防共」的前途了啊！魯迅沒有做什麼長篇大論的政治論文，在不三不四集裏的短文裏，都已充滿了觀察

敏銳的正直言論！

魯迅指出蘇聯是勞苦大眾的模範，是中國的朋友。

「蘇聯的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

蘇聯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去，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一匪徒一才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他們（所謂文明國人）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

「帝國主義的奴才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同前：我們不再受騙了）

是的，民族解放的生活，是反對進攻蘇聯，是『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魔』！

魯迅指示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和牠的奴才，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聯合以半
等。待。我。之。民。族。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七 全國救國運動的怒潮

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底，魯迅就說：

『看罷，妨害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南腔北調集：『守常全

集』題記）

我們總不會忘記這三年來不但在北平，在整個華北，而且還在沿海沿江一帶
的破壞治安的是誰吧？

敵軍是在猛進的吞併中國，帝國主義的奴才，有的跟着牠的主人去殺中國
人，有的聽着牠的主人來殺中國人，可是，血，全國人民救國的熱血，『不但。不。

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華蓋續集：無花的薔薇之二）

魯迅在全國人民怒潮般的要求一致抗敵的時候，他鼓勵救國運動並指導着戰士。

他認為去冬以來的『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所說『進步』是指『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鬪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比如組織的嚴密，遵守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用……』他要我們『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以保障已得的勝利，並在鬪爭的過程中，充實自己的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同時又指示我們，『在鬥爭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幾個重要問題）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同前）『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的加入這戰線。』（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都無妨。』（同前）同時，他認為方塊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使他們難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爲了喚醒民衆，爲了推動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他認為『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幾個重要問題）

魯迅的一生是爲了民族解放，魯迅的提倡新文藝是爲了民族解放！『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四分之一世紀（以上）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何凝）幾十年來的民

族革命解放的鬥爭中，『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自選集自序）魯迅却永遠前進，求遠站在前哨，越戰越堅的指導着我們——特別是我們青年。

我們永遠敬仰他的偉大的人格！在戰鬥中鍛鍊出偉大的人格來！

我們永遠不忘他的戰鬥的精神！在戰鬥中鍛鍊成堅決持久的戰士來！

我們堅決擁護他的救國的主張！在戰鬥中使牠全部實現！

（作者因為時間匆促，沒有能夠有更深刻的研究，只算得魯迅研究的一個草率的開始。同時，對魯迅在近十年來對民族解放運動的觀察和意見，也沒有能更周詳的在本文裏發揮，更是憾事。）

魯迅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梅 雨

魯迅的一生（一八八〇——一九三六）是在中國歷史的一個最嚴重的，最複雜的時期渡過的。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四二）之後，『頑固的中國正在經歷一種社會的危機。……這國家已經站在滅亡的前面，有發生一種暴力革命的趨勢』（卡爾）。這預言立即爲太平運動（一八五〇——六五）所證實。在魯迅出生的十五年前，這革命的太平運動正被無恥的『中興名將』所勦滅，而滿洲朝廷也日比日地潰爛下去。此後，許多新的革命自救運動接連地爆發起來：像戊戌政變運動，辛亥革命運動等等。這些都是中國民族自我覺醒的表現。魯迅就是在這極端嚴重，極端複雜的時期裏出生，成長，以至於死亡的。

在這樣的時期裏，再配合着他個人那樣的生活環境裏，戰士的魯迅的性格之

被形成，是很自然的了。人們大概不會忘記魯迅在吶喊的自序裏告訴我們的那段棄醫從文的插曲吧？當時，他以為救國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善精神的要推文藝，所以他就決心提倡文藝運動。他那光輝的文藝生涯就是從此時期（日本留學時期）開始的。從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看出他獻身於中國文藝運動時，是持着多麼嚴肅的態度，而這態度直到他臨死之前，還是毫無改變。他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現於中國新文壇的，這之後的短短的十八年，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嚴重與複雜的時期。這中間，中國歷史（就是世界的歷史也是一樣）充滿了一系列重大的事變：剛剛過去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它的被鎮壓，崛起及其建立，九一八——一二八的事變及以後的抗敵統一戰線的展開等等。這是一個革命，戰爭和干涉交錯着的世代。所有這些，全都清切地反映在中國的文學前線上。所有這些，也給魯迅的文學活動以無限的影響，也全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無疑的，我

們是可以從他的作品中，他個人的文學活動中看出當代的中國歷史來的。

在魯迅翻譯的死魂靈的序言中，內斯妥爾·珂德略來夫斯基對死魂靈及其作者果戈里曾下如下的評語：

『果戈里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在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上，是佔着極特殊的地位的。這是有藝術價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其中呈現着出於偉大的藝術家和寫實主義者的畫筆的，俄國社會的生活的鉅大而真實的畫像。在這小說裏，俄國的詩人這才竭力將對於舊習慣的他個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觀察，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裏面去，而又只抱定一個希望：說出他所生活着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

『由這意義說，死魂靈之在俄國文學史上，是成了開闢一個新時代的紀念碑的。』

這些話，我覺得大體上是可以移贈給魯迅及其吶喊的。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出現了。在當時，即使是在主倡『文學革命』的新青年（它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上，也只是登載用文言寫作蘇曼殊的創作小說，和陳賡劉半農的翻譯小說。『文學革命』只是空談，還未加以實踐。等到狂人日記出現了，這才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由於它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它大大地激動了青年讀者的心。這是魯迅偉大的十八年來的文藝活動的開始。從此之後，中國文學劃出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的新文學才成爲一種壯大的，爲社會鬥爭服務的力量。在他的不斷的孵育之下，中國的新文學漸趨長成，許多新的作家也陸續出現了。他在文藝上的影響是無限大的。在我們的文藝史上魯迅是一個永遠不朽的名字。

魯迅與革命相遇時，革命已不是一個孩子，但他與新文學相遇時，它還不配稱爲胎兒。梁啟超，蘇曼殊輩的文言作品，與水滸傳等封建性的小說雖微有不

同，但文學依然擺脫不了舊傳統的影響。魯迅出現之前，當時文壇是一片精赤的土地，但他却帶着舊世界給他的優秀的遺產，走上文壇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舊文學，北歐，舊俄以及日本（這是他的新文學修養總匯之地）的文學對他的天才的發展予以有力的影響，但他並不是僅作徒然的模倣，狂人日記雖保有着果戈里式的憂憤，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但魯迅的狂人日記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較果戈里的憂憤來得深廣，是很顯明的。總之，他是從民族生活的土壤中獨立地面而又直接地生長出來的。吶喊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起點，也是中國新文學的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礎石。

當時，在中國的文化領域上正在做着白話與文言的鬥爭，後來更擴大為反封建的與反禮教的鬥爭；因為封建的意識，已經成為中國市民階層的發展的障礙。但中國市民階層本身是矛盾的，在文學上便表現為一種介於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間的動搖，像胡適之的一面主張客觀地分析社會現象，一面又高唱『我口寫我

心」。但魯迅當時所發表的各作品（後來收在吶喊和彷徨二集裏面），却是稀見的，以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手法完成的，富有戰鬥性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反封建制度，反舊禮教的鬥爭裏，盡了一種歷史的任務，而在這種鬥爭的更深的發展中，更有無限的影響。他這種反封建，反禮教的鬥爭，就是稍後在莽原，奔流上也還繼續執行着。這些作品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上一面屹立的，劃時代的豐碑。就是到了現在，它還是沒有失去其革命的意義。

當時未成熟的市民文學，全缺乏樂觀的與勇敢的氣魄，他們的作家們正以自以為苦的憂鬱，傳染給正在做着好夢的青年。但魯迅却反對這種消極。他在藥的瑜兒墳上平空添了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然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雖然，魯迅的積極是有限度的，他的作品裏還多少地沾染了北歐與日俄文學特有的抑鬱，這是在新時代行將到來之前感到窒息和苦悶的智識份子所難免的。魯迅的反對封建制度，舊禮教，以及民衆的一切的敵人，並非憑藉在現在看來是

科學的世界觀，那時候，他正受着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他當時還沒有看清那人類解除一切壓迫，解放一切苦痛所應走的大道。直到一九三〇年初的時候，他還是如此的。但這並不與後來他的也是大眾的路線相違反，這是世界上一切有正義感的智識份子所共有的最寶貴的傳統。在這一點上，魯迅給予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他以及他的作品是以彗星一樣的光芒，衝過市民階層的抑鬱，動搖和頹廢的霧圍，給未來的新興文學掃開一條乾淨的去路的。

在魯迅未被左翼團體所擁有之前，他曾經同當時的『創造社』——其實不如說是與當時文壇上的少壯的急進的份子和集團——發生過一次論爭。直到現在為止，我們文壇上對這次的論爭還沒有公正的評判，但如果因魯迅後來的『轉向』而過分責備當時『創造社』的舉動，我以為是不公允的。誠然，魯迅在北平時曾在他主編的叢刊中出版過蘇聯B·拉甫涅列夫的第四十一，A·勃洛克的十二個

，和L·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等，對新俄的文學盡了介紹的任務，也就是說他已對新俄的文學表示了尊貴的熱愛。畫室在革命與智識階級一文中雖說：『魯迅看見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識階級早一二年』，但他在同文裏也接着說：『不過他也常以「不勝遼遠」似的眼光對無產階級的……』Zino Effi在另一篇文章裏也曾有類似的意見：『他曾經有過一個長期懷疑有在中國創設一種普洛文學的必要，在整個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他總是與革命運動遠離的。』在這種情形下，當時進步的份子爲着希望地更前進，爲着爭取這最偉大的最有權威的作家到自己的文學陣營裏來，自然要對他加以批判。在錢杏邨等的論文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所以這一爭論的形成，與其說是『創造社』等對魯迅的人身攻擊，毋如說是當時左翼團體在策略的應用上的惡劣：譬如理論的幼稚與態度的欠當，都使他們的企圖在形式上化爲一種意氣之爭。

但魯迅的路在中國新文學的大道以外是沒有的。他不過一時保持緘默而已。

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的第二階段，即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及其後的普洛文學，它的成立發展及其擴大這一時期，魯迅也有着非凡的功績。

對於『民族主義文學』，對於市民階級的代言人『新月派』及梁實秋等。甚至對於三角戀愛色情小說的作者（如張資平等等），魯迅都給予猛烈的攻擊。他給讀者大眾指出這些發出惡臭的，沉沉浮浮的死屍，說明他們怎樣爲吸血者所利用，使之用一切手段來壓迫或欺騙，或麻醉大眾以苟延殘喘。由於『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魯迅歷史的地判決了『民族主義文學』的死刑。

另一方面，對於本陣營內的戰友，魯迅也給予寶貴的忠告。他時常憑藉他個人的豐富的經驗，深刻的觀察，和過人的學問揭出當時的集團的缺點，指出戰鬥的路徑，批判了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或『沙龍』的社會主義者等的不良的傾向。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的演講，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他當時的指示，就是在現在看來，也還是沒有失去時效的。

在當時，已有不少人想以科學的文藝理論來作爲批評的武器了，但理論素養的貧乏使這些理論家患了過左的幼稚病。而文學青年們更很難從中文書籍裏獲得這一類的智識。科學文藝理論的移植成爲一種極其迫切的要求。魯迅在這時候便負起了這個任務來。普列哈納夫，廬那卡爾斯基，梅林格等以及日本的藏原惟人等的新興文學理論便接續地被介紹過來。他的翻譯的方法曾被許多人所非難，也有一些人說他從事這種工作是一種投機，但諸如此類的責難，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影響。這些名著還是一本又一本地印出來，傳開去，使正確的文學理論教育了無數的文學青年。現在一般的文藝理論修養的水準如果較一九三〇年前後大大地被提高了的話，那就不能不歸功於魯迅的倡導了。

另一方面，單只翻譯理論的作品，還是不夠的。中國文學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太少了。爲着使文學青年們能夠親近國外，尤其是革命後的蘇聯的文學作品，再從那些偉大的作品裏得着教育與啓發，那麼，國外作品的介紹也是迫不容緩的。

魯迅在這方面盡了他最可寶貴的努力。在他直接的工作——翻譯，間接的工作——編纂之下，給青年們獻上了許多新俄的作品。本來翻譯世界新興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地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牠們能夠於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劃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進步的文學家們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作這工作的，除開魯迅與曹靖華而外，就很少了：潰滅，鐵流，十月等名著的出版，是新興文學歷史上一件很光榮的業績（在這之前，魯迅也曾介紹過好些新俄的理論與作品）。

魯迅的翻譯工作是直到他安息之日才停止的。就是最近幾年，他也介紹了許多優秀的古典作品，死魂靈便是一例。在他的發軔及指導之下，第一個專刊優秀論文與作品的刊物——譯文出現了。近代中國新興文學的成長，得之外國文學的營養也許較之本國的多得多，在這方面，我們永遠懷念着魯迅的不朽的功績。由

他的播種，使新的文學在理論的栽培上和創作的扶養上獲得了鞏固的基礎。未來的中國新文學是大大地借重着這些寶貴的遺產的。魯迅是最富於時代感的，他永遠站在現實的前頭，永遠不忘記爲新社會而戰鬥，這些可以由他主編的許多刊物看出來。從他參預的新青年，到自己主編的語絲，莽原，奔流，萌芽……等，沒有一個刊物是流俗的，落後的，在文化陣線的鬥爭上，全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只要我們考察每個刊物所固有的特點之後，我們便可以瞭然的。而在這些緊張的工作之餘，他還陸續寫了無數的富有戰鬥性的雜感。當『第三種人』要求『自由』的時候，魯迅同其他的理論家們馬上掙住這決定的時機，加以正確的清算，就是『揭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的人們，也在魯迅的筆下現形了。新興文學因這幾次有歷史意義的鬥爭的勝利，更加博得文學青年的擁護。在這時期內，魯迅的雜感，不只在文學上，就是在政治上都應該贏得很高的評價的。在『自由談』時期，魯迅這一類的文章會使統治者手忙足亂，窮於應付。不管身體的衰弱，環境的惡

劣和社會活動的繁複，他的著作，在數量上，在質地上，終是最多產而又最精緻的一位。

我們的文壇有了魯迅，不只多了一個天才的且又是不倦的工作者，又有了一個精神的典範。在不斷的道害與憎恨之下，魯迅屹立着，黑暗的風暴不能搖撼他，反而使他更加勇猛，更加堅定起來。圍攏在他周圍的青年作家們，失蹤者失蹤，慘死者慘死，他自己也被迫趕到『地下』去，但他的文章却越發呈現出鬥爭的鋒芒。中國的青年文學大眾，有了魯迅，在精神上便得到一種鼓勵，一種確信。他不惟以他的作品，且以他的精神來推動新文學運動，來打擊反動的敵人的。

稍後，在語言問題上他也建樹了很大的功績，門外文談同類的同類的雜文有着不小的影響。他對於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倡，使這種語言的革命更順利地進行。總之，他的工作是多方面的。爲着推進整個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他已盡其所有的力量了。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我們的民族遭逢了歷史上空前的殘害。民族的危亡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期。由於這種客觀形勢的轉移，整個民族革命解放運動，也被推進一個更高的階段，在文學的領域裏，也沒有例外。過去新文學運動用血肉建立起來的那個光輝的『本體』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爲着適應統一戰線的要求，文壇上有了『國防文學』這口號，也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論爭。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魯迅的光輝的一面，他從來就是站在時代的前頭的。

由於一部分論爭者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解的不夠，兩口號的論爭大體轉成爲各自想取消對方，而不是批判對方的口號的趨向。雖然這裏不能不歸咎於受魯迅之託而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來的人，他的含糊其辭，及其想藉這來代替另一口號的企圖，成爲這論爭的起因。但魯迅的本意原來只是以這來作爲左翼作家的口號而已。他本人並沒有反對國防文學。『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吧。在總的口號之下，再提

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在另一篇文章裏，他認為兩口號之爭，不應該變成爲「爭正統」之爭，互相「勦滅」之爭，這態度是與統一戰線的原則十分吻合的。

正如魯迅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對於「創造社」，「太陽社」等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學」這口號所採取的態度，即在原則上他並沒有反對那個口號，而是反對提出這口號的人，到了適當的時機，他便馬上成爲那個口號的主倡者，而且是最積極的一員一樣，在最近的論爭中，他的態度也是相同的。可惜在問題還未十分明朗化之前，他便溘然逝世了。這是中國文壇最大的遺憾，也許也是他本身最大的遺憾吧？

魯迅十幾年來的文學活動，從未忘記過對文學青年們的提攜。任何一個青年如果有求於他，他沒有不給與幫助的。有無數的新作家由他的教育而長大起來。

有無數的青年作家由他的指引而走上了文學的大路。他是一個最出色也是最得青年信仰的批評家，許多無名作家的良好的作品，由他的批評，而得到正確的評價，由他的推薦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只這幾點，他對於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也夠巨大了。我相信，他的信札和記事簿，有一天會成爲我們這時代的，這文壇的鏡子，從那裏，我們一定可以得到無數的教益，無數的啓示。我希望能享有得到這教益與啓示的壽命。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有了魯迅，便得到了一個最有力的推動者。魯迅是中國文壇最光榮的代表。比照着那些拋開青年們而開始反叛，爬上死屍，以年青的一代爲腳墊而得了穩固的地位的人們，魯迅的偉大是不能揣想的。自從新興文學被倡導以來，多少人投降？多少人叛變？多少人消聲匿跡？而魯迅呢，他始終舉起正義的旗幟，不斷地作着決死的鬥爭，至死未曾退出自己十幾年堅苦守住的陣地，他的偉大豈是文字可以形容的。

中國的建立新文學的鬥爭，猶如建立一個新的制度一樣，是需要決心與肉體的。魯迅的堅苦的奮鬥，便是中國新興文學的象徵。也是後死的文學青年們的表率。我們的時代是用魯迅這苦難的生涯向後代敘說今日這神聖的戰鬥的偉大同艱苦的。

魯迅與新文字運動

胡繩

一

在上海，魯迅先生喪儀的行列中，有幾塊白布的橫幅很受人注意，那是用北方話新文字，廈門話新文字，江南話新文字寫的，不但在上海，在北平的魯迅先生追悼會裏，壁上也用新文字大書着：『紀念魯迅先生不要忘記他的遺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甚至暹羅出的暹京華僑日報（十一月九日）中紀載當地華僑文化界發起的『追悼魯迅大會』的新聞中也說：『禮堂前之左右兩牆壁則掛有各界輓聯數十對，中有以新文字書寫者爲場中之特品。……』

149

這個事實決不是偶然的。魯迅先生在生前的確是以巨大的熱情支持了新文字運動，而且用有力的言論說服了懷疑和反對新文字的人，鞏固了新文字的理論的

基礎的。

魯迅先生是『封建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武臣』（何凝語），所以他反對傳統的舊體教，反對讀古書，因而也反對文言文，反對方塊頭漢字，也反對脫離了大眾生活的各種紳士學者的空想的語文改革方案；魯迅先生是文化戰線上的最前衛的戰士，所以他支持各種新文化運動，創導新興的木刻運動，他對於新文字運動的支持也是出發於他的一貫的思想和行爲，是絲毫不足爲奇的。

二

魯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駁斥那些以爲『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的『高雅的人』的時候，這樣地說：『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熱風：隨感錄之五十七）魯迅先生正是一個緊抓住『現在』，

『尊重『將來』的『子孫的時代』的人；對於『僵死的語言』，他是一個毫不容情的戰鬥者。』

在五四時代提倡白話文的先生們到稍後一時期却和文言文妥協了，弄得白話文和大眾口語間的距離一天天加長，甚至有人說，『要做好白話，須做好古文』，這時魯迅先生始終堅持着主張：『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口語，更加有生氣。』並且說：『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些古書很有些關係……』（墳：寫在墳後）魯迅先生擁護白話文決不是把牠看成漂亮的紳士語，而是認爲牠應該和大众的『口語』、『活人的唇舌』一致的。——所以他雖是從文言文的『舊壘』中出來，却成了文言文的最不屈服的敵人，正如他從封建社會中出來，却成了傳統的醜惡的暴露者一樣。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又因爲從舊壘中出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

一擊，易致強敵的致命。」（同前）

正因為他始終主張文章應該「接近口語」，反對過去的「僵死的語言」，他從反對文言文而再進一步地澈底反對漢字，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於是「反戈一擊」，便致了漢字的「致命」。

在一九二六年魯迅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華蓋續集：古書與白話），魯迅先生是個澈底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能夠在動的觀點上觀察一切事物，決不做現狀的保持者。他雖然是白話文的戰士，但決不死抱住牠不放，却把牠看做是語文發展到更高一階段去的過渡的「橋樑」——在白話文的發展途上，他已預見了牠的衰亡了。對於漢字，他也抱着同樣的態度，漢字的沒落的命運也早在他的洞見中了；他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從「別字」說開去）。

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以後發表不少文章，對於方塊字做了致命的攻擊。這

裏要詳細地介紹他的意見是篇幅所不容許的，只能極簡單地做一點徵引和說明。

在門外文談裏，魯迅先生從漢字的發展歷史上證明了漢字的必然的沒落，他說：『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了。』（門外文談第四段）

再進一步，魯迅先生就說明了一『漢字和大衆勢不兩立』（論大衆語）的原故。

『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單勞苦大衆，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化費一二十年的功夫，終究不能學會的也多得很。』

魯迅先生的目光永遠看住在『勞苦大衆』的身上，所以主張『將文字交給一切人』（門外文談第七節），方塊漢字，因為牠的難，已經遠遠地和大衆隔離了，魯迅先生不能不大聲疾呼地說：『爲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做了幾千年的文盲來殉難了……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

們的犧牲了。」（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

魯迅先生在一九二六年說：「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偏激之辭。」（寫在墳後面）先生的反對漢字的主張同樣也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難道我們可以把「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呼聲看做只是一種「玩笑偏激之辭」麼？——「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這是魯迅先生向訪問他的人親口說的話。

三

魯迅先生是維持現狀論和溫情主義的改良論的永遠的敵人，他說：「從古迄今，什麼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復古說也來了。」（從「別字」說開去）然而魯迅先生不怕正人君子的反對，偏要一口一道破。他看見了漢字的沒落，便堅決地主張澈底改革。

他反對『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的人』（門外文談），他也反對那種『虛懸』了一個語文改革的『計劃』，故意把計劃弄得『完全和周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的一些學者們（刊於每周文學上的論新文字）。他看準了真正的站在大眾立場上的切於實用的語文改革的方案只有拉丁化的新文字。

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大抵行不通』（門外文談）『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母來，但是那些字都還麻煩，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並且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須有學者的氣概』，所以那都是『不合乎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關於新文字）。

現在有許多人常常以為，在語文改革運動中也有門戶之見，譬如新文字運動者總是顯得和國語羅馬字勢不兩立。但實際上並不如此，在反漢字這一點上，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甚至和注音字母原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前者和後者的差別主要還是在於若干技術問題上，譬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官話，四聲』的應用與否

的問題。而技術問題却是在大衆的實踐中很容易解決的，何者較合乎實用，何者有前途是很明白的事實，本無所謂門戶之見。魯迅先生站在反傳統的立場上，對於注音字母和國羅，過去都曾有過好意，但是他一發見拉丁化新文字是更「合乎適用」的，便馬上做了牠的提倡者了。他說：「新文字却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衆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論新文字）

魯迅先生是完全站在民衆的利益的立場上來倡導新文字的——還有誰能夠比站在民衆立場上的人更雄辯的呢？

四

魯迅先生又具體地對新文字做了各方面的指示。

首先是關於方言問題。既然文字應該和口語一致，而現在中國大衆的口語還

是分歧的方言土話，那麼新文字的第一步不能不是紀錄方言土話。但是有人說，本來漢字是統一全國的，現在豈不是反而犧牲了統一麼？魯迅先生回答：「現在的中國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的，所以必須按着各地方的言語來拚，等到將來再設法統一。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把這個當作一個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學不統一了，但是他却抹煞了方塊漢字本來是多數中國人所不認識，有些智識分子也有並不真正認識的事實。」（關於新文字）而且「當未用拉丁化寫法之前，我們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區域裏，可以彼此互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門外文談）。明白了這兩點，許多懷疑論都可以一掃而光了。

可是又有人說：文字不能不精密，我們的口頭語是不是夠做文語來表達一切思想呢？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言語是發展的，在把方言紀錄到紙頭上去時，原可加以人爲的改革，使牠更豐富化，精密化的。魯迅先生一向主張灌輸歐化的語法

表現法到中國語中，這和他的新文字應該紀錄方言的主張是一點也不矛盾的。魯迅先生在很早就感到：『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寫在墳後面）而救濟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却只有在採用了新文字後才辦得到，因為文言文和白話文是根本把方言土話擱置在一邊的。在大衆語討論中魯迅先生指出，在『在鄉僻啓蒙的大衆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論大衆語）。那便是指引進『新字眼，新語法』，並且使大衆口語有更『精確的意義』。——新文字保證了實現這種改進的可能性。

方言的發展不但是在詞彙的豐富和語法的精密這一方面，還有一方面，便是從分歧的方言土語發展向統一語去。新文字雖然在現在是採用分區發展五——七種的新文字方案的辦法，但牠絕對不反對——恰恰相反，倒是要意識地去促進——各區方言的溶合爲一更高階段的統一語。這一點，魯迅先生也見到的，他說：『我想，啓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前固

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衆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衆化。」（門外談）他一方面反對「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一種統一語的方案，但一方面也反對「一切都聽其自然」，那便是說，統一語的形成也得加以人爲的促進，所以他說：「待到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衆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同上）

魯迅先生的這些指示是新文字運動的指標；我們從魯迅先生後發表的這些零碎的意見中，已經看到了新文字的理論的全部輪廓了。

五

新文字運動要由誰來做呢？當然「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介紹過字母拚法，然後寫文章。」（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但魯迅先生又警告說：「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不看

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門外文談）所以他警告我們『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新文字運動還是要在大衆的實踐中間推進的！

『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分起來同時進行，而推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一切前進的文化人——教育家、文學家、語言學家都在魯迅先生的遺言的指導下面起來從事於這光榮的語文改革的事業吧！

——『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衆語、大衆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門外文談）

一九三六，十一，廿五深夜。

魯迅先生和中國新興的木刻

曹白

一

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是『朝華社』成立的時候。這『朝華社』是魯迅先生和柔石等等幾個堅決的前進的文藝青年所組織的。但他們並沒有什麼浩浩蕩蕩的企圖，只想切實地『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

但我想，除『剛健質樸』，針砭當時卑性的空虛的文藝之外，爲了讀者，當另有緣由吧？東歐和北歐的文學作品，大抵是魯迅先生一向所謂熱切的、叫喊的、憤疾的、反抗的，牠們能指示被壓迫者的前路，能被『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的人們深深地感動和領會。因爲我們和他們，有相同的運命和企求的將來。

至於後者，則魯迅先生在新俄畫選的小引裏，明白地說道：

『多取版畫，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國製版之術，至今未精，與其變相，不如且緩，一也；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二也。』

讀過了朝花夕拾裏的阿長與山海經，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等的文章之後，就曉得，魯迅先生從小就酷愛圖畫的。但他的酷愛的圖畫的對象，跟着他的年紀，跟着他的見解和思想的腳，而逐漸地變更了：他從先前的小說傳奇上的鑰像起，而最後是熱中了歐美的作為書籍插圖的版畫。

而且他還想把牠介紹到中國來。——這是他一貫的啓蒙主義的實踐。——在他編輯奔流的時候，便常常選些西歐的版畫，作為奔流的插圖了。中國的雜誌而用西歐版畫作插圖，怕是始於奔流的？

並且，魯迅先生在最近的十多年中，他更努力於版畫的收集。就像『朝華社』

成立的那時，他已把中國的『畫箋』（木刻的），寄給外國的版畫家，和他們去交換作品了。而『朝華社』裏所出的版畫的集子，大抵是出於魯迅先生的籌劃和經營的。

然而這『朝華社』，只印了朝華週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及藝苑朝華五輯之後，牠就倒閉了。那倒閉的原因，據爲了忘却的紀念裏說，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這團體便在別人的冷漠裏邊結束了。但是，我不曉得，『朝華社』印行的那前三種，給予後世是怎樣的影響，而藝苑朝華的影響是大的！

藝苑朝華一共有五輯，那名目是：

第一輯 近代木刻選集——

第二輯 蔭谷虹兒畫選

第三輯 近代木刻選集——2

第四輯 比亞茲萊畫選

第五輯 新俄畫選

在這些畫冊的每一輯裏，都有魯迅先生做的精湛的『小引』。但其中的落谷虹兒畫選，却是爲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自然這也是給讀者的一面小小的鏡子。而且我想，比亞茲萊畫集的印行，恐怕也還是給做這種鏡子的緣故。

第一第三兩輯，都是近代創作木刻集；就是最後一輯的新俄畫選裏，在全書十二幅畫中，木刻倒佔去了五幅。前者是出於英、法、美、意、德、瑞典、日本諸木刻藝術家的手筆，後者自然都是『新俄』的了。但總之，在這五輯畫集中，有兩集半是近代創作木刻畫。這些，藉着『朝華社』魯迅先生的手，攙到我們這中國的爲妖魔所坐鎮的藝壇的邊頭了。

二

於是乎，我們只才曉得，人家已經把我們『古已有之』的東西，給他現代的生命，作為新藝術品而出現於世界的藝苑了。要是沒有『朝華社』魯迅先生的介紹，到現在，中國能不能發生木刻運動？能有多少人瞭解木刻？這都是很成問題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鼓噪的『大師』（？），高傲的嬌貴的藝術家，他們的趣味完全逗在『羅馬夕照』、『西湖晚涼』裏；他們或則拾了『學院』（Academia）的唾沫當金液，或則鑽向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e）的牛角尖，或則在溫暖的 Salon 裏期待着『神來』的時候，那是無暇，也不屑來理會這種『彫蟲小技』的。因此，藝苑朝華刊行後，魯迅先生的要感嘆『竟爲藝苑所棄』，也是無足怪的了：誰叫他們幹這宗傻事的呢？

但總算還好，那些被介紹過來的木刻，首先被『一八藝社』所接受。

要說出這『一八藝社』的創立的日子，那該是一九二九年——亦即民國十八

年，故名——的一月十二日。這一天，也就是中國新興木刻的誕生的日子，是值得我們紀念的日子。

但「一八藝社」却並不是一個專攻木刻的團體，繪畫、工藝美術、彫刻都有，並且他們還從事於新興藝術的理論的檢討，木刻只有其中的社員：一川和點非等幾個，作着一種嘗試而已。作品，那自然是很幼稚的。這「一八藝社」曾被魯迅先生熱烈地愛護過；他在該社的習作展覽會的「小引」裏說：

「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面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為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他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題得香豔、漂渺、古

是沒有因為被摧殘而熄滅的！

然而中國又沒有木刻的師資，又沒有比藝苑朝華更好的畫冊（不，簡直沒有）！作為青年藝術學徒的參照。木刻只是在這些青年藝術徒們的愛護的熱烈中支持中生存着。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事：那將會有枯萎的一天。

魯迅先生首先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不忍眼望着這自己一手栽培出來的木刻的嫩芽的枯萎。為了藝術學徒，沒法，就只好影造西歐木刻名手的畫冊了。

但印這樣的畫冊，是非精緻不可的。——要精緻到畫幅裏的極其微小的『刀法』，也得看得出，這才使『摸索中』的，『無師』的藝術徒們，得到裨益。然而成本就要大，加上這種不是『繁銷書』，書店老板那裏肯印呢：印起來一定要賠錢啦！

沒有辦法，這回，魯迅先生只得自己來印了。那第一本，就是一九三〇年影造的十幅——

『梅斐爾德 (Meffert) 木刻士敏土之圖。』

因為要精緻，這些圖，是用珂羅版印的。珂羅版一版只能印三百部，而魯迅先生取其精中之緻，印了二百五十冊，不知化去了他自己幾多的心血和金錢。

可是『第三種人』上台了。他們把『連環圖畫』和『麥綏萊爾 (Maseneel) 的木刻』加以一一的叫咬之後，施蟄存就出來說這『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是『罕見書』，那譏笑之態真可掬！但據說另外還有『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一邊說，寫着只有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得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抬高那書價』，云云。

流光易逝，『第三種人』現在又不知變做『第×種人』了！但魯迅先生爲了年青『無師』的藝術學徒，爲了大眾，他的影造這種『罕見書』，是並沒有罷休的：因爲他有的是堅決的信念——

『我的印好書，是有將來的，別人不注意將來，所以就沒有把現在的東

西好好保存起來留給將來的人做糧食的心意。那裏是爲的滿足我自己。」

（景宋：斷片的記述）

不，那過去的『現在』，即六年前魯迅先生把『士敏土插圖』印成『罕見書』的那時的『現在』，使一般年青的藝術學徒們看見了梅斐爾德用了那樣的豪放的刀觸，在木板上犁出了這樣狂熱的圖畫，就感到一種歡喜，一種希望，而且由此也加強了自己們對於工作的信心。這對於中國初期木刻運動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四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內山完造先生的弟弟內山嘉吉先生，到上海來玩了。嘉吉先生是日本的彫刻家。但他沒有進過美術學校，以自修而成名的。他也會木刻。到得上海，魯迅覺得有了機會，可以趁此把木刻上的必需的知識，請嘉吉先生授給我們一向『無師』的野生的藝徒們。嘉吉先生也高興的答應了。

於是，中國第一次的木刻講習會，在魯迅先生的主持下，開講了。然而人很少，爲了當局歷來把新興的木刻看做坦克車的緣故，一切都在默默中進行着。但是大家都很奮興。

嘉吉先生不會中國語，魯迅先生就當翻譯。起先講了許多木刻理論上的知識，學生們是沒有問題的。待得接着實習了，大家動手刻了，於是疑問百出，要問先生，這時候，魯迅先生又當了學生們的翻譯。所以在那悶熱的暑天中，往往弄得魯迅先生渾身是汗；然而他不煩厭，不疲乏；他露着非常的愉快的神情。

這講習會在極短促的一星期內，就結束了的。在最後的一天，把十三個學生的習作，開了一個小小的展覽會，算是大家在這一週中的努力的果實。

從此，木刻界只才得到了製作上的具體的一些寶貴的經驗，是那木刻講習會所賜予的。

那自然是魯迅先生的賜予！其中也有內山嘉吉先生的。

此後，魯迅先生又把他歷年珍藏着的世界的版畫，展覽出來了，——他是不高興把自己所寶貴的東西，祕藏着，像別人一樣，作為傳家之寶。他往往要把自己的快樂去分給大家，望大家也一同像他那樣的快樂着。而一方面，自然也叫藝徒們看看世界名手們的壯大的相貌，不要滿足在自己的渺小的影子裏。——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緣故。

所以，藝徒們往往在生活的困苦的鞭笞下，在強暴們的百般摧毀中，往往砥乾了自己的傷痕上的血污，又默默地伏在那裏刻畫了：

『我們有魯迅先生的激發和鼓勵呢！怕什麼呀！』

五

在一九三四年的三月，魯迅先生把他前三年中陸陸續續用白紙去換來的，一束奇美而堅實的花果——蘇聯的木刻，又自費出版了。就是那有名的——

引玉集。

這真是我們木刻界裏的奇蹟的發現。

他怎樣會得到這束奇美的花果的？在他引玉集的後記裏面，就有這樣的幾段：

「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Graphika*）這一種雜誌上，看見載着畢司凱萊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托靖華兄去搜尋。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司凱萊夫，終於將木刻寄來了……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於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我於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之內」和「鳥之子」，寄給靖華，託他轉致，倘有餘剩，便分送別的木刻家。這一舉得了意外的收穫，兩捲木刻又寄來了，畢司凱萊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一幅，法復爾斯基六幅，保夫理諾夫一幅，岡察洛夫十六幅；……」

當魯迅先生得到——尤其是意外的得到這些木刻的時候，他該全心的被激動了吧？一定是的！他一定被快活所迷惘了。但他又覺到極度的不安：

『但這些作品在我手頭，又彷彿是一副重擔。我常常想想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了，而但祕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菲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我便決計選出六十幅來，複製成書，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

他這才心地安寧下去了。由此，我們也看見世界上的新文化的建設者，雖然他們住在兩樣的國度裏，而心是總在一塊兒的！

引玉集的出版，尤其對於藝術學徒，好比是微猛的春雷的一擊，都震驚了；那是愉快和製作慾念的激動，一方面也更堅決了自己的信念。於是各地紛紛成立

了研究木刻的團體，捲起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甚大的浪潮。

最使人注意的，就是在引玉集出版後的第三個月裏，廣州『現代版畫研究會』成立了。『現代版畫研究會』縱然在木刻的認識上和製作的態度上，犯了錯誤，然而他們於木運的推進上，給予了很大的努力，是不可否認的。其次，在『現代版畫研究會』成立之後的也是第三個月裏，北平和天津，有了『平津木刻研究會』的組織。

『平津木刻研究會』一成立，他們首先就在一九三五年的元旦發動了一個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這展覽會真是空前的盛舉。先不先，他們分成四個部門成立了。

- 一、中國古代複製木刻畫。
- 二、國內現代創作木刻畫。
- 三、國外現代創作木刻畫。

四、參考品部。（這一部把製作木刻的必需的道具，也都陳列了出來，使觀衆增加製作木刻過程上的瞭解，吸收了許多親近木刻的藝徒們，這一點，發揮了展覽會的最大的效力）。

這次展覽會的規模之大，號召之廣，對於木刻影響之深，是先前所沒有過的。而且此後『平津木刻研究會』又攜着這展覽會的全部，到天津，濟南，太原去舉行。上海也來的，就是『一八藝社』社員，中國木刻的前驅一川死在牢裏的這一年。

由於這流動展覽會，不知加多了幾多的藝徒！而且獲得了社會上普遍的同情和愛好。新興木刻運動這才更其的強壯了。

這是引玉集所培成的！

六

寫到這裏，使我又很苦痛的想起了他那一段話：

『我好像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對！全中國的新人，都是吸了魯迅先生的乳汁和血液，而滋補，而長大的。其中尤以木刻青年藝術學徒爲最多。在這些藝徒們的流血和枯萎之間，跌倒或是躺下了，但他們也往往抬起頭，想仰仗着一點別人的衛護或營養，來延長那將要結束的短促的壽命。然而除了我們的魯迅先生一人之外，就不再有別的人了。

『魯迅先生是給我們乳和血最多的人！』

今年是他病得最厲害的一年。然而你看他，往往在極其困苦的病中，掙扎出來，用着他那病了的顫抖的手，寫那熱烈的戰鬥的『寫在深夜裏』。然而你看他，往往在極其困苦的病中，在計劃着如何如何地印版畫，掙扎出來，用着他那病了的顫抖的手，在一張一張地摺疊着他一樣熱烈而戰鬥的偉大的革命藝匠柯勒惠支(K. Kollwitz)的版畫選集的頁子……

不，他在摺疊柯勒惠支的版畫選集的頁子之前，又在那裏精印阿庚(A. Agin)

的死魂靈百圖了。百圖一出版，我就去把牠買了來，又是那麼壯旺美麗的一冊，拿在手中，心裏覺得沉澱澱的，太使人心愛了。但他在百圖的序上，說，他所以要翻印百圖的理由，是『第一，是在獻給中國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者……第二，則想獻給插畫家』，而『對於木刻家，却恐怕並無大益，因為這雖說是木刻，但畫者一人，刻者又別一人，和現在的自畫自刻，刻即是畫的創作木刻，是已經大有差別了。』

當時看了這意思，我頗不以爲然，就寫信去反對，說這對於中國の木刻家，是有極大的裨益的。理由有二：一，中國現下的木刻者很少有基本工夫，看了百圖的描繪、透視、色彩、佈局等等手法上，有『大益』。二，看了其中人物的輪廓、姿態、個性、動作等等的表現上，也有『大益』。三呢，現在木刻界正盛行着一種懶病，看了百圖在構圖上的謹嚴和密緻，統一性和明瞭性，可以使他們日漸驚惕起來，那就更有『大益』了。

沒有幾天，他的回信來了，那是五月四日的，對於我提出的幾點，倒也並未加以駁斥，只是說：

『死魂靈百圖，你買的太性急了，還有一種白紙的（按，我是買的黄紙的，是先出的普及本。）印刷較好，正在裝訂，我要送你一本。至於其中的三張，原是密線，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國又無印刷好手，於是弄到這地步。至於刻法，現在却只能做做參考，學不來了。此書已賣去五百本，倘全數售出，收回本錢要印托爾斯泰的安那·卡萊尼娜的插圖也說不定，不過那並非木刻。』

你看，他還要印安那·卡萊尼娜哩！雖說是『並非木刻』吧，但這種事情，中國就只有他一個人做。七月裏，他果然把一本『白紙』印刷的百圖，送來了。並且在八月二日又寄了一封信給我，說道：

『我並不是對您特別『餽贈』，凡是爲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

總希望能夠（並非爲了個人）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因爲書局印的，都偷工減料，不能作爲學習的範本。最可惡的是一本蘇聯的版畫，牠把我的一篇文章，改換題目，作爲序文，而內容和印刷之糟，是只能表示「我們這裏竟有人將蘇聯的藝術，糟塌到這麼一個程度」。

「病前開印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到上月中旬才訂成，自己一家人禮紙并檢查缺頁等，費力頗不少。但中國大約不大有人買，要買的無錢，有錢的不要。我願意送您一本……（內附士敏士插圖一本，是上海戰前所印，現已絕版了），印得還好，刀法也還看得出，但要印到這樣，成本必貴，使愛好者無力購買，這真是不能兩全。」

呵，好極！這回我可以看見魯迅先生拿去紀念柔石在北斗上的犧牲作者的更多的作品了！趕緊打開來看，一頁一頁的，是力、是愛、是憤怒、是鬥爭。其中還織有魯迅先生病了的蒼白的臉影。

柯勒惠支是這樣的拿着她那魄力的刀，砍向這醜惡的人間了。這是偉大的巨製！然而藉着已經病了的魯迅先生的手，我們才有福氣看見的。並且在她的畫的巨大裏，是織着那樣嚴密的刀觸，那無異給予我們年青的藝徒們的重重地一擊，使我們『驚起』。

七

關於我們的『驚起』，魯迅先生在參觀蘇聯版畫展覽會記裏就提到過：

『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鴛是燕，競尚高曲，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作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 (A. Kravchenko) 新作的尼泊爾建造 (Dneprostroy) 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鐘。』

這一段話，我和朋友們說到木刻的時候，就要提起牠，因為這是對於我們製作上的極其沉痛的針砭。猶如他在今年四月一日給我的信裏，有這樣的話：

『中國的木刻家，最不擅長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缺少在基本工夫。因爲木刻究竟是繪畫，所以先要學好素描；此外，遠近法的緊要是不必說了，還有要緊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線一錯，就一場胡塗。現在常有學麥綏萊爾 (Frans Masereel) 的，但你看，麥氏的明暗，是多麼清楚。』

因爲繪畫的新技術的來到中國，還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木刻藝術學徒，一般的說來，基本工夫的修養，是很不夠的；這缺點，只要在刻畫人物的時候就完全暴露了，而況還帶着中國的文人畫和西洋的印象主義的惡毒的遺傳和感染呢。先前，最努力製作的『現代版畫會』諸君，而以這惡毒的遺傳和感染，當做好的，加以號召、宣揚、擴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但後來也到底自覺了。可是在圖畫上的人物，面貌總是觀念的，內容總是公式的。——這也是木刻界的一般的毛病——給予觀衆的是單調、是呆板、是做作、是空虛。

雖則我在所謂『重見天日』之後，爲了嚴厲的生活的鞭策，使我不再能夠木刻，但也終究還沒有忘記牠。爲什麼的？一是因爲我爲了牠而受過難，二是牠已深深地埋在我的心裏了。所以和魯迅先生的通信裏，總還常常要提起木刻的事情來。

今年夏天，聽說，木刻流動展覽會，要到上海來舉行展覽了。當時我就去告訴他，並且還附去力羣刻的叫我轉給他的肖像。沒有幾天，回信又來了：

『我對於現在中國木刻界的現狀，頗不能樂觀，李樺諸君，是能夠的，但自己們形成了一種型，陷在那裏面。羅清楨細緻，也頗自負，但我看他的構圖出於拼湊，人物也很少生動的。×君（按，卽力羣）給我刻像，謝謝，他沒有這弊病，但他從展覽會的作品上，我以爲最好是不受影響。』

『版畫的事情，說起來話長，最要緊的是介紹作品，你看柯勒惠支，多麼大的氣魄，我以爲開這種作品的展覽會，比開本國作品的展覽會還要

緊。

但木刻流動展覽會畢竟於十月六號，在青年會九樓開幕了。這的前五天，我就把請柬送了去，意思並不是邀他去參觀，我曉得他的病是沒有全好的，只是告訴他，叫他知道知道就是了。但誰知，竟在展覽會的閉幕的一天，這一手栽培了中國木刻藝術的病了的老人，在大家的不意中，來參觀了。他惦記着木刻，他要看一看這年青的孩子的面影。

他不贊成開這種展覽會。然而這是他對於年青的木刻家在製作上的嚴肅的暗示！不然，他何必還要帶着病來參觀呢？他何必來看他自己一手栽培起來的這孩子的幼稚的面影呢？

在這次的展覽會場上，魯迅先生和藝徒們談了許多話，貢獻了許多關於木刻的基本上、技法上、修養上的寶貴的意見。他愛着，他惦記着木刻。

然而他回到家裏，說，很疲乏了……

八

魯迅先生所做的那兩篇文章，就是蘇聯版畫展覽會記和蘇聯版畫集序，是指示木刻藝徒們的此後走路的燈塔，是他對於木刻藝徒們的再三的叮嚀，我們是不能忘記，也不可以忘記的。比如，他在蘇聯版畫集的序言裏，就這樣的希望着：

「這展覽會（按，即蘇聯版畫展覽會）對於中國給了不少的益處；我以為因此由幻想而入於腳踏實地的寫實主義的大約會有許多人。」

「寫實主義」是魯迅先生歷來對於文藝的一貫的意見，也是我們所應該而且一定要達到的。你沒有看見他接着就這樣的寫道嗎？

「我覺得這些作者，沒有一個是瀟灑、飄逸、伶俐、玲瓏的。他們個個如廣大的黑大的化身，有時簡直顯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後，開山的大師就忍飢，鬪寒，以一個廓大鏡和幾把刀，不屈不撓的開拓了這一部門的藝術。」

這回雖然已是複製了，但大略尚存，我們可以看見，有那一幅不堅實，不懇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凡這些話，木刻藝徒們都應該牢記，加以深思。因為這是他所針對着我們的毛病——在木刻界盛行着一種在製作上惡劣的傾向——而說的。『依傍和模仿』，那裏能夠產生『真藝術』？

但和別的一樣，蘇聯的木刻大抵是中國の木刻者的最好的榜樣。魯迅先生在蘇聯版畫展覽會記裏說：

『版畫之中，木刻是中國早已發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從新興起的是取法於歐洲，與古代木刻並無關係。不久，就遭壓迫，又缺師資，所以至今不見有特別的進步。我們在這會裏才得了極好，極多的模範。』

九

蘇聯的木刻也真有我們『極好』，『極多的』模範，我們是不能忘記魯迅先

生的提示的。因為這，我就天天盼望着他自印的代替引玉集而出版的拈花集，因為他在今年的三月中就告訴了我了：

「……引玉集……再版完後，不再三版了。現在正在計劃另一本木刻，也是蘇聯的，約六十幅，叫作拈花集。」

然而已經來不及，他，我們的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在十月十九日的清晨，離開了我們，悄悄地辭世了。

我那裏想到，在木刻展覽會場上，成了他和我的最後的一面，他和木刻界的永遠的訣別呢？

再也不能喚回我們的魯迅先生了。

但他遺下的工作，關於木刻這一部分，還不止一本拈花集，還有麥綏萊爾漫畫集和E·蒙克版畫集和十竹齋畫譜三卷呢。

這是說，一個偉大的勤勞者，神聖的工作這一慾念的火把燃燒了他，直到他

要停止呼吸的時候。還不肯歇手！

但當我們尙未看見那代替引玉集拈花集的時候，就暫且再翻開引玉集來看看吧。可不要不看那『後記』，尤其是要看『後記』的末段：

我對於木刻的介紹，先有梅斐爾德的士敏土之圖；其次，是和西諦先生同編的北平箋譜；這是第二本，……但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於木刻的介紹，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閒們的譏笑了。』

『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閒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但也到底不能喚回我們的魯迅先生了。全中國的青年藝術徒們好像突然失去了

他們的母親——失去了我們的母親了。我們將從此變成一個無告的孤兒，將在暗夜和別人的仇視裏，會受到更大的磨折的吧？一定的！然而，「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偽自由書：前記）何況，我們的母親已用乳和血，撫養了我們七年，如力羣新波等等，已能很會走路了呢？……

但也到底不能喚回我們的魯迅先生了！但我們要「銘記」他的遺言，不要忘記他給我們的再三的叮嚀，我們這才能有更廣大的前途。在走路的時候，我們要時時反顧，在魯迅先生的精神底燈塔的光耀中，沉毅地前行。一面提防着路旁射過來的毒眼。

一九三六，十一，十八。

附 魯迅先生對於版畫工作的年表

一九二九年

近代木刻選集——（1），「小引」並「附記」（選印畫冊。朝華社藝苑朝華第

一輯。共十二幅。計有英國的惠勃 (C. C. Webb) 三幅，司提芬·蓬 (Stephen Bone) 一幅，達格力秀 (E. Fitch Darglish) 兩幅；法國的哈曼·普耳 (Herman Paul) 兩幅；美國的富耳斯 (C. B. Falls) 一幅，華惠克 (Edward Warwick) 一幅；意大利的迪綏爾多黎 (Benvenuto Disertori) 一幅；瑞典的麥格努斯·拉該蘭支 (S. Magnus-Lagercranz) 一幅。

近代木刻選集 (2)，『小引』並『附記』(選印畫冊。朝華社藝苑朝華第三輯；共十二幅。計有英國的格斯金 (Arthur J. Gaskin) 兩幅，傑平 (Robert Gibbings) 兩幅，達格力秀 兩幅；法國的凱亥兒 (Emile Charles Carlegle) 兩幅；德國的奧力克 (Emil Orlik) 一幅；美國的左拉舒 (William Zorach) 一幅，日本的永瀨義郎 一幅。) 落谷虹兒畫選並『小引』。(選印畫冊。朝華社藝苑朝華第二輯。日本落谷虹兒作，計十二幅。)

比亞茲萊畫選並『小引』（選印畫冊。朝華社藝苑朝華第四輯。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作，計裝飾畫十二幅）。

一九三〇年

新俄畫選並『小引』（選印畫冊。朝華社藝苑朝華第五輯。計有十二幅：克林斯基（Klinsky）三幅，克斯加夫（Kestov）一幅，法復爾斯基（V. Plavorsky）木刻一幅，未詳作者木刻兩幅，保夫里諾夫（Pavlinov）木刻一幅，央南珂夫（I. Annankov）一幅，克魯格里珂跋女士（E. Kruglikova）兩幅，古潑拉諾夫（N. Kupreano）木刻一幅）。

梅斐爾德士敏士之圖並『序』（自造畫冊。德國梅斐爾德（Carl Moller）木刻十幅，珂羅版印。今絕版）。

一九三一年

木刻講習會（講師，內山嘉吉先生，魯迅自任翻譯。學員十三人，計時一星

期)。

一九三二年

第一次珍藏版畫展覽會。

地點：狄思威路，北四川路，上海購買合組，日語學會。

出品：蘇、法、德等國。

『連環圖畫』辯護（南腔北調）。

一九三三年

第二次珍藏版畫展覽會。

1. 第一展覽會場。

地點：北四川路，千愛里，四十五號。

出品：德、蘇、法等國。

2. 第二展覽會場。

地點：老靶子路，海能路，日本青年會。

出品：蘇、法、比、西、葡、美等國。

北平箋譜並『序』（與西諦合印，共六卷，為保存中國固有之木刻而印造，由北平木刻名手複製。今絕版）。

十竹齋畫譜（與西諦合印，共四卷。非賣品。此亦為保存中國固有之木刻而印造，由北平木刻名手複製。因工程浩大，至今僅出一冊，餘在刻製中。）

一個人的受難並『序』（選印畫冊。良友圖書公司印行。麥綏萊爾 Frans Masereel 木刻連環圖畫之一。共三十五幅。）

創作木刻法序（南腔北調）。

論翻印木刻（南腔北調）。

集選中國新興木刻世界流動展覽會作品（此展覽會為法國 V. D. 之女記者所主催。曾於巴黎、柏林、莫斯科展覽，倍受歡迎。此為中國現代木刻與西歐人氏

第一次的接觸。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並『後記』（自造畫冊。刻者都是蘇聯的名家。共六十幅。珂羅版精印。今絕版）。

木刻紀程並『前記』（自造畫冊。作品出於中國現代木刻藝徒的手筆。借用原版印行，共二十四幅。今絕版）。

選印譯文月刊插圖。

一九三六年

蘇聯版畫展覽會記（刊於二月二三日申報第三版。後為蘇聯版畫集的序言之一部。）

蘇聯版畫集並『序』（選印畫冊。良友圖書公司印行。此為蘇聯版畫展覽會出品的結集，共一百五十九幅。作家約五十左右。內有木刻，銅刻、石刻、獨幅版

畫等。)

死魂靈百圖並『小引』(自造畫冊。橡皮版精印。俄A. Agin繪，培爾那爾特斯基(Bernarlski)刻。此爲果哥里(Fogol)詩篇死魂靈的插圖，共一百另五幅。並附櫻可羅夫(P. Sokolov)插圖十二幅)。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序目』(自造畫冊。依原拓本及藝術護衛社印本畫帖，用珂羅版精印。德國凱綏·珂勒惠支夫人(Kathie Kollwitz)作。計有木刻兩幅，石刻六幅，銅刻十五幅。自造印版已絕，此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E·蒙克版畫選集(選印畫冊。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麥綏萊爾漫畫選集(選印畫冊。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遺作

拈花集(自造畫冊。蘇聯木刻，約六十幅)。

魯迅主義底永遠的敵人

歐陽山

阿Q正傳研究

從皇帝到狗的精神狀態，性格，所信奉的主義底結晶在一個中國農民身上開放了燦爛的花叢，阿Q跑到人間來了。驕傲的阿Q如果在人數比上不曾代表了中國人民底絕對多數，他絕不輕易隨隨便便到人間來的。他代表了統治者全部，中間的知識者全部，冷酷的小市民全部，和農民，流氓無產階級中間落後的一大部份；他底天才的創造者魯迅先生當創造他的時候不過一個人，後來是所代表的人數也逐漸顯明而增加了，但仍然是極少數而且差度極大，遠不如阿Q底臣民那麼純粹和一致，因為那裏面有許多還是從阿Q底靈魂底掌握中奪取過來的。

十六年前中國的讀書界傳播着那麼有名的精警的偉大的句子，如像：

『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

『阿Q以爲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他以爲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

『……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他不過以爲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游街要示衆罷了。』

現在這些句子——和他底全部著作一道，仍然是那麼有名，精警而偉大，而且流遍了全世界了。他希望牠們『速朽』——用意非常顯明，但中國人底緩慢的步伐却使牠們不朽；集合了一個民族底智慧的作品即令自願腐朽也是不能夠的。

瞭解他底每一篇作品應該和他底全部著作一道當做一個整體去瞭解，對了，這非常重要。我們讀他底只有一二百字的文章，或僅僅偶然想起他底一句話，我

們便立刻看見他永遠活着站在我們眼前，帶着他一生的光輝的戰績和堅強、慈愛、嚴肅的笑貌。

阿Q型

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一的十年間，即是辛亥革命到魯迅先生做成他底阿Q正傳的十年間，中國政體在名目上是變革了，社會改造家鼓吹起種種的新思想來了，而純粹的中國人民還一面受着帝國主義底迫害，一面生活在幾乎沒有起過波瀾的封建思想裏。靜修菴革命事件是這樣的『革命』底具體說明。

封建精神既然煙霧一般瀰漫着鄉村、市鎮、商埠、官衙、營盤和學校，於是人們便頑固、守舊、苟安、迷信而無賴、異常看重宗族勢力，毫無緣由地遵守着一切愚蠢的忌諱，並且實踐着以女人爲犧牲的男性自私主義。

這種封建精神培養着千千萬萬人底異常可笑的劣等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嗜好着全無根據的即使是惡意的捧場，經常做出非份的自大和浮誇，尊敬自己而輕

蔑別人，切實相信着以微幸心理做根據地同時是緩衝地的沒出息的定命論，而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物，遺忘了真理殺死了同情，一律是幸災樂禍。——不錯，幸災樂禍。這是魯迅最愛描寫的主題之一。人們老是把別人底不幸，愁苦悽慘的禍事當做毫不動情的笑樂的資料這件事，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斷定曾經令那樣堅強的鬪士感到過悲觀。

在和上面所舉的幾點相反的另一方面，人們又保持着衰弱萎靡，不可理解的矛盾的習慣，即是自輕自賤自虐，易忘身受的恥辱而常常做『退一步想』。

遇到敵人了——這是苦惱然而無法避免的，他們堅持着敗北哲學所規定的卑鄙主義。對於這種人，英雄的固定的姿勢和戰法是沒有的，專門吃軟不吃硬地挑選可以欺的負竅穴，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沒有御用雜誌的他便筆戰。打敗了，他便記起『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格言而一方面自居君子一方面以『講理』做遁形的符咒。他們，總而言之是抵賴，欺善怕惡而對較弱者却異常殘酷。

更值得紀念的魯迅先生底發現——也更值得研究的，是『精神文明』和『精神勝利法』，這使阿Q一步登天躍上了統治哲學底權威底寶座。

『精神勝利法』從『我總算被兒子打了』或更早以前開始，像血脈一樣貫通了阿Q全身和阿Q正傳底每頁；而關於『精神文明』魯迅先生明白地說了：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纔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當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於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却沒有這樣乏，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第四章：戀愛的悲劇，吶喊一三四頁）

這麼響亮有力的人性底悲劇的宣言，在中國，在魯迅先生以前，我們沒有聽見過。如果不是在做夢，阿Q時代誠然已經死去，這宣言便該瘖啞了喉嚨，爲什

麼如今不管我們把牠投下中國隨便那一個角落，牠還會發出轟震的像砲和雷一般的巨響呢？

魯迅先生用了對於已經腐爛的存在物的可驚的知識，對於苟延殘喘的封建文化和全部學問底辨解力，精細的結構和出奇的獨創的藝術手腕創造阿Q。魯迅先生任由奔放的，不靜止，不凝滯的海洋一般的天才，背負山嶽一般的雄偉的魄力和對人類無限捨身的熱愛，地心之火底噴發，孔道一般的眼睛所發出的淒厲的沉痛的慘笑創造了阿Q。

反抗一切傳統的勢力和精神的孤立人

燈柱孤立在荒島和礁石上面被兇險的波濤嘲笑、咒罵，但他們不能淹沒他底光明。他是孤立的，他底同伴在遠遠的天界之外，也是孤立的。他以孤立的永不熄滅的火光拯救了千千萬萬的行旅。

同樣，使魯迅先生孤立而又不能不果毅地負起拯救中國底重責的是辛亥革命

底猴子化裝一樣形式的轉移。他是一個政治家或是一個思想家，一個詩人或一個武士，他全會做出驚人的事業來。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命運底歷史的分叉點上看來（雖然不過是形式的轉移）那意義是極其偉大的，但從有名無實的皇室統治交代給內容和形式合一的割據的封建軍閥統治，却不能不使一個稀有的天才立刻伸手指指出，這不是一種成功的『收場大吉』，而不過恰好是一種革命的開始。

城裏的舉人老爺和村鎮的秀才攀親，鎮上的土劣都把辮子收藏起來，一班假洋鬼子胸前都掛上白銀桃子——所有的榨取階層底安寧生活都由晃蕩不定而終於起了波瀾，革命到來了。

在中國，猶如英國某政論家對辛亥革命後四分之一世紀的去年的兩廣事件所斷言的一樣，激烈的抗戰是不會有的。也沒有如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那樣瘋狂殘暴的報復行爲。假如沒有魯迅來給牠畫出一個準確的輪廓，像靜修菴事件和城裏的革命黨，那麼我們將永遠不知道中國也和世界上別的國家一樣有過一回民

主思想的革命了。

阿Q——和保持封建精神，具有矛盾性格，信奉卑鄙主義的他底真正的血統一道，怎樣發揮他們底確保優勝的保護色作用又倉忙不迭地來迎接革命呢？魯迅毫不隱諱地指出了他所洞察的真理：他們對革命無知而認識又完全錯誤，他們深惡革命而立刻着手利用革命這被他們底思想和性格所確定的必然的結論。

阿Q被他們自己的真正的血統所槍斃了，他一生的非意識的活動終結了。十幾年以後他並且有那樣的殊榮被一個理論家重新槍斃了一次。

然而阿Q並沒有死。即令以魯迅那樣的戰鬥力和他戰鬪了幾十年他還是沒有死。阿Q正傳所做的結論並沒有停止了指導的任務。

由於那鮮明的結論所指示，我們知道對革命無知而認識又完全錯誤，深惡革命然而立刻着手利用革命的不止阿Q一個人，成功了，把革命利用得巧妙而安穩的，重新站上統治地位的是舉人老爺、把總、假洋鬼子、趙秀才這一夥。

他們這一夥——阿Q正傳裏的全部人物，阿Q正傳外的全部阿Q血統——除了衣服相貌年齡姓名以外都無限增加着存在的阿Q底廣大的普遍性。

在未莊，人們重視宗族勢力（倘在上海則是宗派主義了），但一得了勢却也
不認親戚。人們施行着點燈舂米式的壓榨，地保強索酒錢和孝敬錢式的壓榨，但
一面小心窗門，一面收買贓物。人們冷酷地看着別人的打架，但對於略有些醒目
的人物，就『與其慢也寧敬』。人們全有着麻木的靈魂，不能信任真理也不能信
任虛偽，但以勢力為轉移，就是信任勢力。而最可痛恨的是：以別人底不幸做自
己笑樂的資料。——這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是阿Q正傳底第二結論。

若以魯迅先生所指定的特殊的阿Q和其餘觸目皆是普遍的阿Q（絕不限於
農民）比較，我想魯迅先生是『與其憎也寧愛』的。阿Q固然曾經以為假洋鬼子
——那『裏通外國的人』底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但是請看阿Q游
街示衆時和阿Q被槍斃以後的那使人顫慄驚悚的兩段吧：（吶喊一八五——七頁）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喫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纔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遊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因為阿Q雖然也犯罪，但那是屬於非意識底的，罪惡底意味不及意識地犯罪者深而明；論個人，阿Q比未莊上其餘的人都好，他沒有詭計，也不吝嗇。

關於採用南邊一個鼻子，北邊一對眼睛來創造小說裏的人物，魯迅先生在某一本書裏給過我們一點啓示，而關於怎樣創造阿Q底複雜的頭腦他却講不講。

阿Q是東方文化底代表人，一切東方的嗜好、興趣、習慣、思想都深藏在他底腦筋裏，因此規定了一切愚頑、無知、卑鄙的行動、阻礙對於世界的進步思想的瞭解和接受，並結合了一切反動的傳統的勢力和精神。西方的人物在思想上最初鄙視和憎惡這種活人和民族，但由於多年經商的經驗，他們反而改變了態度成爲歡喜和頌揚，只怕中華民族有一天要失去這種良好的品格了，因爲沒有一個商人會喜歡和頌揚自己的聰明的主題的。

這許許多多的阿Q底傳統的勢力和精神正鑄合成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像海洋和空氣包圍着大陸一般包圍着中國，而中國底阿Q正傳裏所沒有的新興階層還十分幼小而軟弱，才剛剛伸出頭來，於是魯迅先生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悲哀和寂寞了，一直到他碰到也正感到寂寞的新青年之羣。

把辛亥革命認定是一種革命底開始，毅然承擔了歷史使命，要來掃除帝國主義和一切傳統的勢力和精神的新興階層那時還不曾成長，於是魯迅先生決定自己迎戰了。在一個短短的期間中他完全成爲一個孤立的人。

魯迅主義

這時候年輕的階層長大了，足以擔負起偉大的革命的任務了。牠有了豐富的氣力和精神的武裝和一切歐化的科學的技術，足以向正面的敵人挑戰，並且嘲笑另一降生更早的但不久就害了癱瘓症的階層。

這偉大的人類底信號一從中國發送，魯迅先生就與牠合流了，這不相爲謀的兩方面的道却是相同的。把一切醜惡的東西從中國趕出去，——不管那是幾千年來在中國早就生了根或是近百年來才發現的，讓我們勇敢而快活地生活着，讓我們創造全新的和中國一切傳統的勢力和精神絕緣的文化，原來都是魯迅先生開始戰鬥時所明白表示的主張和要求。

魯迅先生底敵人增加了，戰友增加了，戰線也延長了，但這時候仍然他發現了他底老朋友，那手下敗將阿Q出沒於敵方或甚至可哀地，混進自己的戰線裏，這使他好笑，高興，然而也無聊。——他早已不把阿Q當做唯一的戰鬥對手了。

他做了許多的苦工，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戰役，他常常鼓勵年輕人做種種工事並教導他們堅強勇猛的戰鬥意志，但他自己却像老於捉蛇的有癮的人一樣，有時隨手一撈就捉起一個活蹦蹦的阿Q。阿Q累積了多年被捉的經驗，學習了各種的化裝術，沒有在未莊時那麼好相與，易於欺負，且容易混過青年們底眼睛，有時只有魯迅先生才認得他了。

攻擊阿Q和他底變動的相貌，變種的血統，摧毀一切傳統勢力和精神底堡壘，是貫通魯迅先生一生事業底源頭長遠的泉流。勝利哲學的魯迅主義是敗北哲學的阿Q主義底永遠的敵對。

我曾經說一個文學者底思想常常是他終身的東西而招到了非難，我實在不知

道我底話爲什麼會是謬誤的。其實是如此，一種偉大的思想必定是思想者終身的信仰和終身的實踐底化學底結合。勝利的赫赫有光的魯迅主義底創造者怎樣規定他底人生哲學和科學的戰鬪的世界觀相一致呢？

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做如下的解答：

切實地探究了存在的真實——榨取方式，意識形態，矛盾底鬪爭，精神底向下狀態，衝突着的階層的各自的痛苦，外來的，對固有物加以無情的灼炙使之起劇烈運動而呈現可驚的變化的民主思想等等，魯迅先生創造了消極的典型人物阿Q，而使自己一生的一舉一動和阿Q完全相反，一秒鐘也不鬆懈地對抗着自己的俘虜。

他在任何場合打擊宗派行幫主義（宗族勢力在都市裏採取的形式），他說話毫無忌諱，他以他底急進、勤勞、嚴肅、科學精神、對真理的服從，反抗國粹的守舊、苟安、無賴、迷信、頑固。爲反對以女人爲犧牲的男性自私主義，他尊敬

女性——尤其當那是一個遭屠殺或酷刑的女性，援助女師大的學生運動，向現代評論展開了長久的鬭爭。

他絕對擯斥別人的捧場，退還『思想先驅』的王冠而且切實指明一切的捧場不過如『阿Q真能做』式的別有用意。他常常把自己放在一個渺小的地位裏和惡霸們對抗，他非常尊敬別人的努力，事業，或簡直不足稱道的小小的成功。他反對微幸心和定命論，以爲希望任何意外的獲得是愚蠢的事，但工作——苦苦的工作可以改造人類和所有的一切。『幸災樂禍主義』令他傷心，他同情任何人所碰到的即使很輕微的疾病和損害，好像一個專門顧問似地細心解答別人一切煩難，而當別人得到少許的快樂的時候他比別人加倍地高興。

他絕不自輕自賤自虐，他是自重自尊自愛的；他不能忘記任何恥辱，也不寬恕任何敵人，不做『退一步想』而總在做着『進一步想』，所以他只知道前進而不知道後退。

於是我們就講到魯迅先生最精粹的地方來了，那是他底對抗卑鄙主義，使多少『英雄豪傑』垂頭喪氣，唏噓嘆息的強硬主義。

我重覆一次，卑鄙主義集合了精神文明，精神勝利法，抵賴，欺善怕惡，以講理做護符，對弱者異常殘酷，——攻人之弱，乘人之危這些特點而成立，魯迅底強硬主義的行動就和牠完全相反。

表現在他底全部著作和事蹟中，我們知道他把中國傳統的唯心的衰萎現象激烈地顛覆了。嘲笑精神文明以及『公理戰勝』，唾棄精神勝利而寧可保存名義上吃虧的實際勝利。不但不抵賴，不能『莫管他人瓦上霜』地生活下去，而且相反地常常被俗人看做『自尋煩惱』地代人負責，這時候責任有多大，會使他碰到如何的困難和損害，完全被他拋棄在考慮點之外。他選擇敵人常常選擇最惡辣，『如虎，如鷹』的一類而放過小雞和羊，他以最高的智慧，尖銳的眼光，忠誠的利益，害判斷決定了他底敵人而進擊，在該用拳頭的時候就用拳頭，絕對不做煩瑣的冗

談或曉曉的辯解，而被他認定做攻擊目標的處所又必然是敵人最強的，集中精銳的一點。

舊人道主義者有時也幫助弱者，憐憫他們，不過那限度被制定得非常狹小，只在使弱者不太難堪。魯迅先生底幫助弱者的目的是在打倒那殘暴的強者，不使有第二個弱者出現，因此他底幫助常常是無端的，過量的，出於身受者意料之外而且使他驚訝的。

但是以上這一切，是他故意的，機械的，矯情的行爲麼？不，如果是那樣，他就一件像那樣的事情也做不出來了。他和阿Q之間完完全全地存在着自然的本質的對立。

『這是尼采主義的思想呵！』阿Q這樣叫了。

因爲尼采思想是中國民族最厭惡，最不相容的暴漢主義和狂人主義，和在俄國，人們把『討厭的』高爾基稱呼做尼采主義者的狡計是一模一樣的。請看他們

之間有着怎樣的被明哲的人們承認的『相同』之點吧：

尼采保薦他底超人給少數的榨取階層的卑怯人物做打手去了，而——他，魯迅底內容在於把一切和阿Q對抗的氣力、人格、和成果都結算在勞動大眾的勝利裏。

這樣，和阿Q主義和尼采主義對抗，我們把牠稱呼做魯迅主義。

一月十六，一九三七。

魯迅研究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上海福州路

編者

夏征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月初版

研究普式庚的要籍

普式庚研究

茅盾等譯

實價八角

普式庚是近代世界文學的發源者，今年正是這位文學家及詩人的逝世百年忌。但是從新的視角來論述他的生平作品，用忠實的譯筆來移譯他的作品的書，我們還沒有。本書分上下二編，上編係論文，分論他的精神、寫作方法、童話等；下編為普氏的作品：有小說五篇，詩三首及童話詩一首。研究與作品並收。譯者茅盾先生等，俱係名家。這是譯文社三年來介紹普式庚的精華，用以供獻給普氏的研究者。

杜布羅夫斯基

普式庚著 立波譯
『復仇』即『三角』 實價三角

魯迅先生
三大譯作

錶

班台萊夫著 五版 四角

桃色的雲

愛羅先訶著 三版 七角

小約翰

F 望覃葛著 三版 八角

生活書店 發行